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2022

*Financial  
Information*

财商信息

2022年第3期（总第29期）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 目 录

<b>财商管理论坛 .....</b>	<b>1</b>
寻找券商股中的“招商银行” .....	1
保险协会王玉祥：大力发展科技保险 全面护航科技创新 .....	5
管涛：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看上缴储备投资收益的金融影响 .....	9
证监会姚前：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研制与应用 .....	13
<b>财商教育专栏 .....</b>	<b>19</b>
大学生财经素养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探究 .....	19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以《金融工程学》课程为例 .....	26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	31
<b>公益慈善专栏 .....</b>	<b>36</b>
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 .....	36
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	41
<b>绿色金融专栏 .....</b>	<b>48</b>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	48
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分析 .....	53
<b>区块链专栏 .....</b>	<b>61</b>
克服合谋掩饰行为：智能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运行机制耦合 .....	6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现代税收管理模式探析 .....	67
<b>山商实践探索 .....</b>	<b>73</b>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专业课课程思政原则探讨与体系构建——以《国际经济学》 课程为例 .....	73
高校学生收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	78



## 财商管理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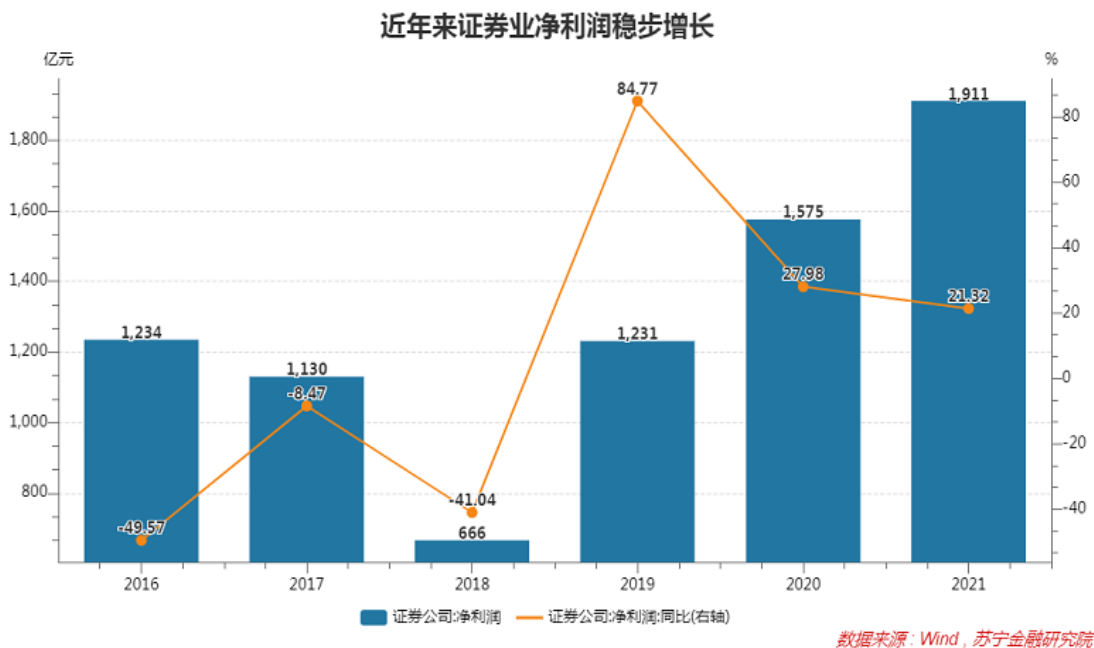
### 寻找券商股中的“招商银行”

进入 3 月份以来，市场多空因素交织，波动加大，对投资者来说，与其在情绪面里打转，不如踏踏实实去研究基本面。中长期来看，基本面才是决定行情走势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短期情绪面与中长期基本面的背离，往往蕴藏着较好的投资机会。

就现阶段的 A 股市场而言，不少行业都出现了基本面与市场情绪的背离，比如券商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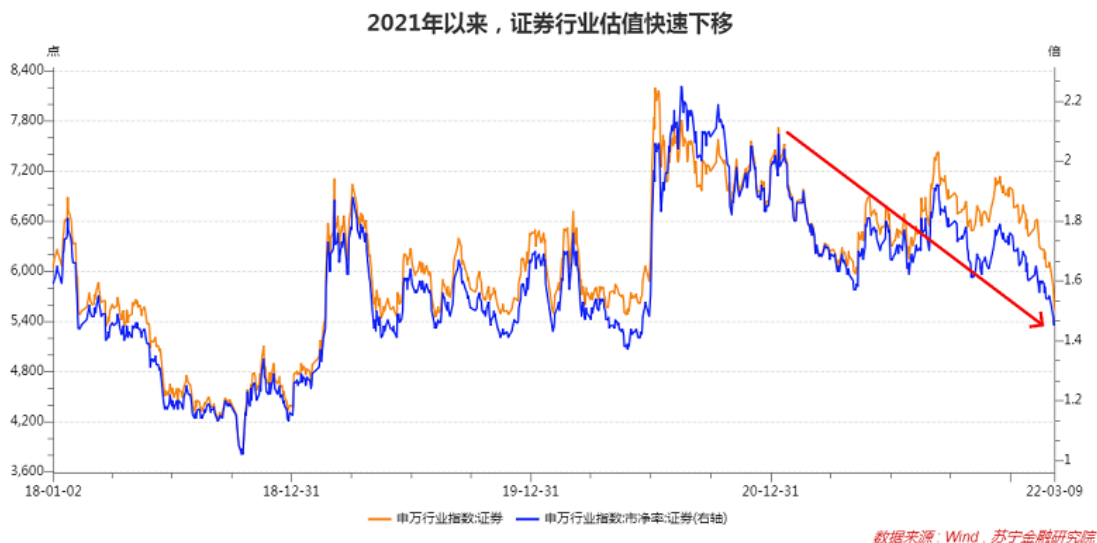
#### 一、券商：基本面与情绪面的背离

自 2018 年盈利触底以来，证券行业已连续三年实现利润正增长，且增速还不低。据证券业协会数据，2021 年，证券业实现营业收入 5024 亿元，同比增长 12%；净利润 1911 亿元，同比增长 21.32%。



从结构上看，上市券商的情况似乎还要更好一些。截至 2022 年 3 月 11 日，A 股共计 21 家券商公布了 2021 年业绩快报，合计归母净利润 1005 亿元，同比增长 41.35%。

但令市场略感意外的是，券商盈利在快速增长，股价却在不停下跌。自 2021 年以来，券商板块估值水平不断下移，当前市净率已回归至低点水平，处于 2015 年以来的 16.7%分位。



一直以来，券商板块被视作“加杠杆的指数”，与大盘指数同方向涨跌，且涨跌幅度更大，弹性更好，就好比是指数加了杠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券商业绩与大盘牛熊周期密切相关，且放眼整个 A 股，也只有券商行业有此特点，故而又“牛市旗手”之说，即当市场预测到牛市即将降临时，聪明资金就会率先布局券商股，导致券商股率先起飞。

券商业务主要包括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交易及机构业务、资产管理等四大类，无论是哪一项，其经营业绩都与股市的牛熊周期密切相关：

比如投行业务，主要面向企业客户，包括股权融资（含 IPO 和再融资）、债权融资（债券承销）和财务顾问（并购重组）等三大块。牛市中股票估值更高，企业更喜欢在牛市中 IPO 和再融资，所以，牛市环境下券商的股权融资类投行业务通常更繁荣，业绩更好，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相比之下，债券承销的周期性要弱得多。

比如财富管理业务，主要面向零售客户，包括代理买卖证券、代理销售基金等理财产品、融资融券等业务，以及股票质押回购、资产托管等。一般来说，牛市中市场交易更活跃，投资者买卖证券和基金的热情更高，券商的财富管理收入也会明显增长，具有较强的周期性。

相比之下，交易及机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的周期性要弱一些，但也仅仅是弱一些而已。比如券商自营投资，虽然底层资产以债券等低风险产品为主，但占比较低的权益投资随市场牛熊周期波动，强化了自营投资收入的整体波动性。

考虑到券商板块与指数行情的密切关联，当前券商板块的低迷，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市场对大盘指数缺乏信心的映射。但问题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若还简

单地券商视作指数加强版进行投资，可能会错失一些重要的机遇。

## 二、重新理解券商股的 $\alpha$ 与 $\beta$

如果大家经常读投资研究报告，会发现报告里经常出现两个希腊字母  $\alpha$  和  $\beta$ 。 $\beta$  可以理解为平均收益，行业的  $\beta$  对应着大盘指数行情，个股的  $\beta$  对应所在行业板块的行情； $\alpha$  则是指超额收益，行业的  $\alpha$  是指行业本身相对大盘指数的超额收益，个股的  $\alpha$  则是个股相对所在行业的超额收益。

就券商股而言，由于业绩表现和股市周期密切正相关，所以市场一般只关注券商板块的  $\beta$  行情，不太关注券商的  $\alpha$ 。其结果就是，只有在大盘指数快速上涨攒足了人气且市场预测有一波牛市行情时，人们才会想到去投资券商板块；除此之外，市场对券商板块多处于漠视状态。

从历史复盘来看，通常券商板块在大盘指数突破重要关口时才会大幅上涨，而券商股的快速上涨又会积聚市场人气，将指数行情带入新的区间平台。一旦指数在新平台上站稳，券商股的使命似乎也就结束了，不再受市场关注。

举例来说，2014 年上证综指突破 2012 年以来的高点 2460 点后，券商板块加速上涨，旗手效应引发市场资金跟进，将上证指数带入 2500 点-5000 点的区间平台；2020 年上证综指突破 3000 点前后，券商股也迎来一波加速上涨行情，将上证指数带入 3300 点-3700 点的区间平台。

但市场最有意思的一点恰恰是，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且量变引发质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原有的逻辑就会悄然失效，刻舟求剑便会遭遇失误。就券商板块来说，无论是券商的  $\alpha$  还是  $\beta$ ，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断改写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

### （1）崭露头角的 $\alpha$

如前所述，券商的几大业务都有周期性，但周期性有强有弱。随着券商业务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强周期性的经纪业务依赖逐步减弱，具有弱周期性的资产管理业务、机构业务、投行业务占比逐步提升，券商板块的周期性正不断减弱， $\alpha$  开始崭露头角。

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例，过去两年在结构性牛市效应驱动下，居民财富加速向资本市场转移，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市场迎来了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券商通过券商资管、控股或参股公募基金、控股私募股权基金以及机构业务等参与其中， $\alpha$  属性凸显。

就 2021 年的市场表现来看，资管业务营收占比较高的券商明显跑赢整个板块。最典型代表是广发证券，因参股两大基金公司龙头易方达基金（非货基规模第一名，持股 22.65%）和广发基金（非货基规模第二名，持股 54.53%）而备受市场关注，全年涨幅 60.4%，显著跑赢大盘。

## （2）券商的新 $\beta$

就券商的  $\beta$  属性来看，居民财富逐步从房地产转向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为 A 股的长牛格局奠定了流动性基础。此外，随着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快速发展以及险资、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加速入市，机构投资者占比逐步提高，叠加全面注册制的推行，A 股的中长期波动性有望明显下降，慢牛行情可期。

在长牛慢牛行情下，市场自身的波动性下降，意味着券商正迎来一个全新的  $\beta$ ：业绩波动性降低，股价的投机属性下降，长期持股体验更好。

在这个意义上，券商板块正迎来全新的投资逻辑。

## 三、寻找券商中的“招商银行”

站在行业大势的角度，当前的券商板块与二十年前的银行板块有颇多相似之处。

过去二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旋律，在这个时期，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大放异彩，也居功至伟，相应的，银行板块走过了黄金发展期，成长为盈利最多的行业。

站在当下的时点，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不确定性变大，融资体系也势必从厌恶风险的间接融资向拥抱风险的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倾斜。作为最重要的直接融资居间服务机构，券商必将迎来黄金发展期，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长期投资价值凸显。

所以，如果投资者愿意站在五到十年的长期视角，当前布局券商板块正当其时。接下来若想更进一步，还可以寻找券商板块中的  $\alpha$ ，也就是寻找在行业景气度下最受益的券商，类似于 20 年前在银行板块提前锁定招商银行。

问题是，谁会成为券商板块中的招行呢？

企业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就招商银行的发展路径看，其最大特点是提前锁定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盈利能力更强且更易建立护城河的零售业务，然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摒弃短期投机主义，专注地实施既定战略。因为战略在长期是正确的，所以战略长期实施下来也是成功的，助力招商银行在同



质化行业中建立起护城河壁垒，且业务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和复利效应，给长期投资者创造了  $\alpha$ ，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

回到券商板块来看，投资者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券商中的什么业务可持续强、毛利空间大且容易形成竞争壁垒？答案可能见仁见智，长期投资毕竟是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认为对的才容易长期坚持，所以，这里也不再向读者透露我自己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板块中寻找已在相关业务上建立起相对优势的候选券商，然后再去考察该券商的企业文化和治理机制，看看其是否能坚持长期主义，是否能吸引优秀人才。在任何一个行业，优秀的企业都是少数，优秀的企业也总能脱颖而出，所以，只要用心去找，是不难找到的。

最后，给投资者做一点心理按摩。投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是一件单纯的事情。市场短期波动很大，我们需要从中跳出来，着眼于自己的能力圈，在自己熟悉的行业中寻找值得长期持有的“招商银行”，然后，长期持有就是了。

作者：薛洪言 苏宁金融研究院

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sOfvlvyo\\_gPGVNyj4Qi5w](https://mp.weixin.qq.com/s/nsOfvlvyo_gPGVNyj4Qi5w)

## 保险协会王玉祥：大力发展科技保险 全面护航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2021 年 11 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强化科技保险保障作用”及“强化科技保险服务”，鼓励保险机构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形成覆盖科技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保险保障，加大科研物资设备和科研成果质量的保障力度。鼓励保险公司为科技企业提供综合性保险解决方案，通过承保大型商业保险和统括保单等方式，更好服务大型科技企业保险需求。

### 一、科技保险发展稳中向好

市场探索不断深入。我国科技保险的发展可分为市场探索、创新试点和全面推广三个阶段。20 世纪九十年代属市场探索阶段，当时尚未出台统一指导文件，



主要在地方政府组织下，保险公司自行探索开展相关业务，囿于市场认知等因素其成效并不理想，1997 年科技保险逐渐淡出市场。第二阶段是科技保险的创新试点阶段。2006 年，原保监会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科技保险试点的正式启动。2007 年、2008 年，两部门先后确定了两批次共九市三区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经过两批试点的经验积累，2010 年原保监会和科技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科技保险发展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同年，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促进科技和金融相结合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科技与金融全面融合的主张，号召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等共同搭建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平台。2021 年，《意见》的发布进一步为保险业服务科技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上踏出方面坚实一步。

**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年来，保险业积极提升科技保险的保障能力，为技术研发和项目孵化保驾护航。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保险业协会”）统计，2017~2020 年的 4 年间，科技保险为相关企业和机构提供风险保障超 1.79 万亿元，累计支付赔款超 22.63 亿元。4 年间除 2019 年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收缩引起保额略有波动外，科技保险保额总体成上升趋势，年均增长达 18.49%；4 年间科技保险赔款呈逐年增多趋势，年均增长达 38.42%，为科技创新发展起到积极保障作用。

**产品体系逐渐丰富。**近年来，针对科技企业或研发机构面临风险的不同，科技保险产品供给也日趋多样化。目前，市面上的科技保险主险产品大约有 181 款，主要分为五类：一是国家对科技产业补贴的保险产品。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保险、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综合保险、软件首版次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等。2015 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保监会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建立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保险业协会相应制定发布了行业示范条款，引导行业产品开发。保险业围绕首台（套）、首批次和首版次积极创新开发产品，截至目前，市场上“三首”科技保险的主险产品约有 40 款。二是针对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及相关人员的传统保险产品。如高新科技企业财产综合保险、高新科技企业雇主责任保险、科研人员意外保险等。三是针对高科技技术、产品使用的责任保险。如科技企业产品责任保险、人工智能系统责任保险、药物临床试验责任保险等。这类产品降低用户使用高科技技术和产品的顾虑，有利于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四是针对知识产权的保险产品。例如专利执行保险、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知识产权质押保证保险等。这类产品可对科技企业或研发机构知识产权面临的各类风险提供保障。五是针对科研费用损失的保险产品。如科技项目研

发费用损失保险。

**行业研究有序推进。**在中国银保监会指导下，保险业在科技保险领域不断加强探索，深化理论研究，建立行业合作机制。2021 年 6 月，中国银保监会财险部牵头成立中国集成电路保险共同体课题组；同年 10 月，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在上海正式成立，致力于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贡献保险力量。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课题组的成立在整合我国保险行业力量，支持国家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行业，为国产芯片研发制造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科技保险服务方案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2020 年 12 月，在保险业协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保险创新发展大会上，“科技保险服务科技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分论坛成功举办；从科技与保险融合发展出发，分析我国科技保险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客观研判科技保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东湖科技保险创新示范区总体方案》精神，保险业协会与武汉市政府正在推进建设“武汉东湖科技创新风险管理实验室”。2021 年 7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非车财产保险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暨第一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在非车财产险专委会下设立科技保险工作组，为行业推进科技保险领域相关工作搭平台、建机制、找抓手。根据规划，科技保险工作组在今后 3 年内将着力推动科技保险基础研究、承保模式探讨、细分科技行业调研、优化科技保险发展外部环境等专项工作。

## 二、科技保险发展面临问题

近年来，科技保险发展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在实务中也显示出一些短板，需要政府部门、保险机构和科技企业共同面对和解决。

**产品创新动力不足。**保险产品同质性比较明显，现有险种结构覆盖面狭窄、投保险种过于集中，科技企业的部分风险还得不到保障。在保险产品供给上，因科技保险实际运作时面临诸多问题，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意愿并不强烈。例如，科技保险统计数据不足，缺少赔偿样本数据积累，导致科技保险产品费率厘定难；科技企业涉及众多高新技术，保险公司缺乏相关专业人才，风险管控上存在难度；部分高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逆向选择，部分险种的赔付率较高。另外，还存在一些企业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滋生道德风险，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这些都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科技保险供给意愿。

**企业风险认知不足。**从科技企业的需求来看，行业整体的参保意愿并不强烈，参保率较低。一方面，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认知程度不够，将其简单地理解为

对科研要素提供风险保障，对科技保险保障的多样性和风险标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在投保过程中常局限于选择责任险、企财险等常规险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对保险在科研活动和企业经营方面的风险保障和风险分散的作用认识不足。此外，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宣传不足，保险产品对科技企业风险覆盖不足，也是导致科技企业参保意愿不强的原因。

**政策引导力度不足。**地方补贴政策不稳定，不同试点地区制定的关于科技保险的配套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对象以及方式存在差异，易造成各省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且存在部分试点城市对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况。其次，部分省市对引导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引导措施有待丰富。一方面是要提升科技保险补贴政策更新的及时性；另一方面是要进一步丰富科技保险的引导政策，仅仅依靠财政补贴难以达到全面推广的效果。

### 三、科技保险发展任重道远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挥科技保险的保障作用，护航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意义重大。保险业需凝聚各方合力，主动谋划，深入推进，竭力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进科技保险发展的有效途径是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为科技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包括设计保险制度，规定财政补贴的方式、补贴比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等。例如，苏州高新区是全国首家“保险与科技结合”综合创新试点地区，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包括通过设立科技保险创业投资基金，成立“保险+科技”产业创新研究院、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产业基金，对各类保险机构、人才提供落户奖励和办公用房补贴，设立“人才创业险”“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等举措，成功吸引众多“保险+科技”相关企业和机构聚集。但各地区在科技保险引导上存在差异，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补贴资金范围和到位率较为有限，对科技企业投保科技保险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建议政府部门将一定比例的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以及通过各渠道筹集的资金作为科技保险专项引导资金，采用分类定率、逐批递减和总额制约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合理财政补贴，激发科技企业投保动力。

**进一步优化保险产品供给。**保险公司需结合科技行业特点和需求，丰富产品体系，加强科技保险产品创新，为科技企业量身定做更有竞争力的保险产品，切实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在保险产品创新上，建议科技企业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配合提供相关经营数据，以便保险公司不断丰富统计样本和风险数据，实现对科技保险产品的科学准确定价。在承保模式上，可以借鉴担保型等其他承保模

式，与企业、银行等其他机构共担风险，获得更多科技项目的参与权，充分发挥科技保险项目的融资作用。此外，建议研究建立健全科技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合理分摊承保风险。

**进一步增强宣传推广力度。**为更好推广科技保险，政府部门、保险公司、科技企业等相关主体应就科技保险的相关问题及时开展沟通，可借鉴深圳、重庆等地区的推广模式：如深圳市科技局联合市银保监局，与试点保险公司建立科技保险联动工作机制，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需求开展针对性推广；重庆市政府联合保险公司采取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宣传科技保险，一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定期培训、宣讲和实地需求调查；另一方面在科技部门网站开辟“科技保险”专栏，围绕科技保险政策、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情况、科技保险补贴申请受理流程等内容予以公开介绍。

除了积极开展科技保险的宣传推广工作，科技企业自身也需提高风险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对科研开发过程的阶段、风险及其周期有一定的掌握和认知，正确评估科技风险大小，选择更适合企业特点的科技保险产品。

作者：王玉祥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

来源：当代金融家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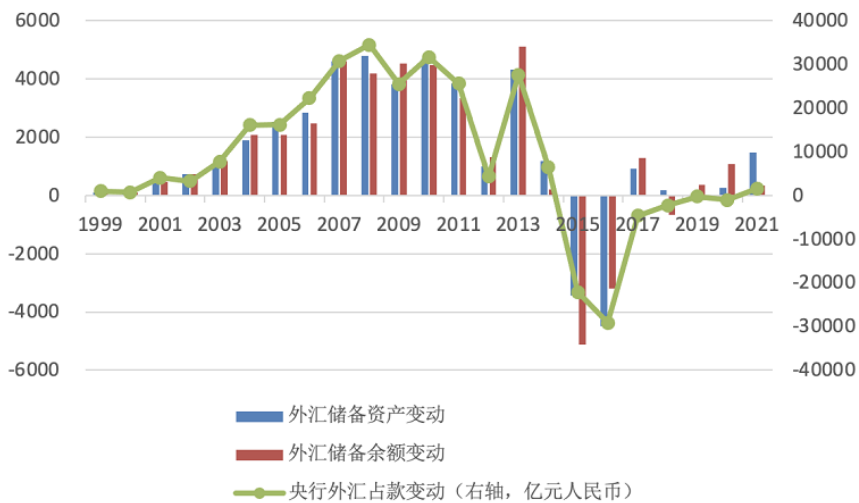
<https://mp.weixin.qq.com/s/MjDX6bSQ1C0INxzwf8A6qw>

## 管涛：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看上缴储备投资收益的金融影响

近日，人民银行对外披露，拟向财政上缴上万亿的结存利润，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这是落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保证赤字率下调但财政支出强度不降的一项重要举措。据悉，这部分央行结存利润主要来自过去几年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这部分收益上缴会产生怎样的金融影响，本文拟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 一、中国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中已包含投资收益

目前，人民银行按月公布外汇储备余额，外汇局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按季公布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变动，后者剔除了汇率及资产价格变动引起的估值影响（见图 1）。



(单位: 亿美元; 亿元人民币)

图 1 中国年度外汇储备余额、外汇储备资产及央行外汇占款变动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WIND; 中银证券

(注: (1) 外汇储备资产变动为剔除估值效应后交易引起的变动; (2) 估值影响=外汇储备余额变动-外汇储备资产变动。)

其中, 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变动又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引起的外汇储备规模变化; 二是外汇储备投资收益,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贷记“初次收入”的“投资收益”正值, 借记“外汇储备资产变动”负值; 三是其他交易引起的变化, 如用外汇储备做委托贷款或政策性注资, 引起官方外汇储备减少, 而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其他国外资产”增加。

## 二、储备投资收益不论是否上缴均已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对此次人民银行依法上缴储备投资收益时指出, 根据《人民银行法》, 人民银行每个会计年度收入减支出, 并按核定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 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世纪疫情爆发后,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 暂停了上缴利润, 以备不急之需。有关机构因此形成了一些待上缴的结存利润, 这次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按程序批准后被安排上缴 2021 年以前形成的部分结存利润。

可见, 过去按惯例, 央行将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按年度归大帐后, 上缴中央财政。在境内以人民币划付时, 反映为央行“外汇占款”变动 (即“国外资产: 外汇”变动)。如 2010 年, 外汇储备资产和央行外汇占款分别新增 4696 亿美元、3.16 万亿元人民币, 折合 1 美元新增外汇储备资产需增加 6.73 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 与同期年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77 仅偏离了 0.5%。再如 2013 年, 外

汇储备资产和央行外汇占款分别新增 4327 亿美元、2.76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1 美元新增外汇储备资产需增加 6.38 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与同期年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19 仅偏离了 3.0%（见图 1）。

只是近年来作为预留政策空间的手段之一，央行储备投资收益没有按年度依法上缴。如 2021 年，外汇储备资产和央行外汇占款分别新增 1467 亿美元、1559 亿元人民币，折合 1 美元新增外汇储备资产需增加 6.38 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大大偏离同期年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45。这表明外汇占款变动不能充分反映新增外汇储备资产的变化。

但是，鉴于其已经反映在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资产中，故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会有所体现。按照权责发生制和有借必有贷的会计记账原则，央行对此在资产方记在“其他资产”增加、负债方记在“其他负债”增加（央行对财政的待上缴利润）（见表 1）。

表 1：截止 2022 年 1 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单位：亿元人民币）

	2022-01		2022-01
国外资产	225,696	储备货币(基础货币)	331,197
国外资产:外汇(中央银行外汇占款)	213,201	储备货币:货币发行	111,877
国外资产:黄金	2,856	储备货币:非金融机构存款	25,041
国外资产:其他	9,640	储备货币: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	194,280
对政府债权	15,241	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6,041
对政府债权:中央政府	15,241	债券发行	950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134,700	国外负债	1,036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	4,112	政府存款	49,781
对非金融公司债权		自有资金	220
其他资产	23,376	其他负债	13,900
总资产	403,125	总负债	403,125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银证券

这次央行将结存的部分储备投资收益上缴财政，以人民币划付使用不会减少外汇储备规模，也不存在“二次结汇”增加外汇储备规模，而只是已记账目的结构调整。这不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总量，故不会引起财政向央行的透支，也不会

额外增加税收或经济主体负担。2015 年“8.11”汇改之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有人觉得外汇储备多了是个负担，建议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老百姓，或是直接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这都涉及到外汇储备的无偿分配使用，属于财政向央行透支。储备投资收益上缴财政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在预算中决定是否将其用于社会福利目的，而这不涉及财政向央行透支。

### 三、这次储备投资收益上缴财政将影响市场流动性

如前所述，央行向财政上缴包括储备投资收益在内的上万亿结存利润，将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在以人民币提取和使用过程中，虽然不存在“二次结汇”，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但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从资产端看，央行上缴储备投资收益，将减少央行“其他资产”余额，相应增加“外汇占款”投放。从负债端看，财政收到上缴利润后，将减少央行“其他负债”余额。之后，如果财政没有及时用出去，则增加“政府存款”，这对市场流动性没有影响；如果财政及时花出去了，给企业办理了留抵退税或者用在了基层“三保”，则变成企业或住户存款，增加“储备货币”（即基础货币）余额，进而增加市场流动性。

有人将此比作全面降准 50BP。这种类比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全面降准，属于深度释放中长期资金，影响的是货币乘数而非基础货币总量。而前述操作却是直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则不确定，尽管最终结果均反映在广义货币供应 M2 的变动上。按照过去 12 个月滚动平均的货币乘数计算，这 1 万亿元的结存利润上缴财政后，若能够用出去，可带动 M2 增加 7.23 万亿元，到年底拉动 M2 增长 3.0 个百分点（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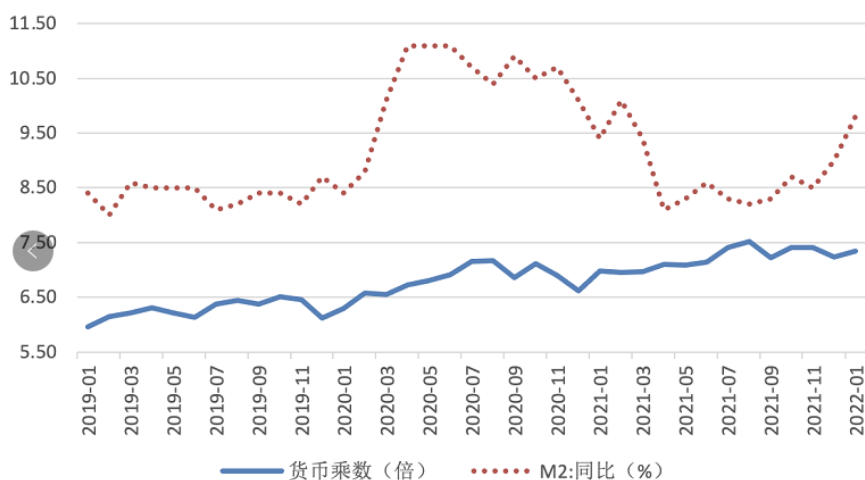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货币乘数与 M2 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银证券）

这一操作不仅将给企业和家庭提供真金白银的现金流支持，还可以通过影响流动性影响市场利率走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当然，央行也明确表示，结存利润将按月均衡上缴，保持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这也有助于减轻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性。这一措施体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联动，共同发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综上，从金融影响看，一是这次央行上缴结存利润是以人民币划付，不会减少外汇储备规模；二是这次上缴只是现有央行资产负债表账目间的调整，不是“二次结汇”，既不会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不会导致央行“扩表”；三是这次上缴将从负债端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支持，但从资产端增加“外汇占款”投放，既不等于央行恢复外汇干预，也不代表即期外汇供求的新变化。

作者：管涛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fWl2cg\\_ISbhvkGOa1MwCKw](https://mp.weixin.qq.com/s/fWl2cg_ISbhvkGOa1MwCKw)

## 证监会姚前：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研制与应用

据社科院统计，2020 年底我国居民财富已达 549 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占比达到 57%。我国居民多为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的财富管理已成为影响国家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金融产品种类繁多，部分产品结构复杂、宣传隐晦、信息不透明，对于产品内蕴含的金融风险，中小投资者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因此，资管产品相关标准建设尤为重要。

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为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同时为资管产品标准化指明了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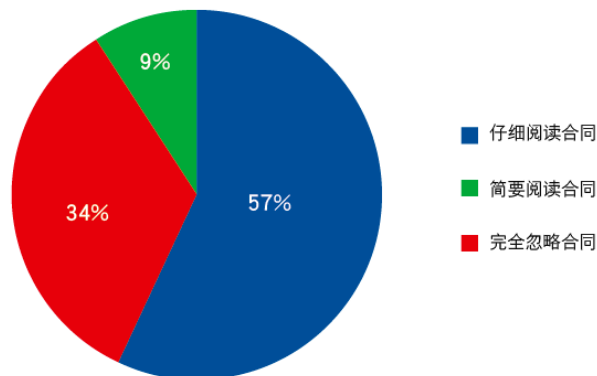
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资管产品标准制定工作，组织有关监管部门、市场机构，在对境内外市场进行深度调研，广泛征求落实行业意见的基础上，历时 3 年完成了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的研制。2021 年 5 月 13 日，一行两会联合发布金融行业系列标准《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JRT 0215-2021），包括银行理财产品（JRT

0215.1-2021)、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JRT 0215.2-2021）、信托产品（JRT 0215.3-2021）三部分。该系列标准是国内首个资管产品相关的行业标准，投资者可通过资管产品介绍清晰、全面了解产品信息，客观、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其中，《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 2 部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JRT 0215.2-2021）规定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的要害要求，制定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模板。

### 一、出台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的现实意义

为规范资管产品销售管理，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对各类资管产品的募集、信息披露、销售等环节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对资管产品合同内容也提出了要求。但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在阅读合同条款方面，仍有 43.48% 的受访者简要或者完全不阅读合同（见图 1）。资管产品因自身结构复杂，导致产品合同篇幅长，专业术语多，投资者阅读难度大、阅读比例低。金融机构在实际销售中往往通过资管产品介绍资料，列出产品的主要特点，提供给投资者。

图 1 阅读合同条款调查



因缺少统一标准，资管产品介绍资料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同类产品展示要素尺度、维度不一致，用词过于专业化等问题。出于销售需要，各金融机构的推介要点大多聚焦在产品优势、管理人、基金经理的背景渲染上，对产品自身特性的要素展示不足，甚至有的产品介绍资料披露信息片面，只重视产品收益信息、缩减或不提示产品风险等内容。投资者在购买资管产品时获取信息片面、混乱，对产品难以理解，无法准确评估产品风险收益特征，难以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资决策。这不利于财富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因此，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建立行业统一、规范的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及范本，非常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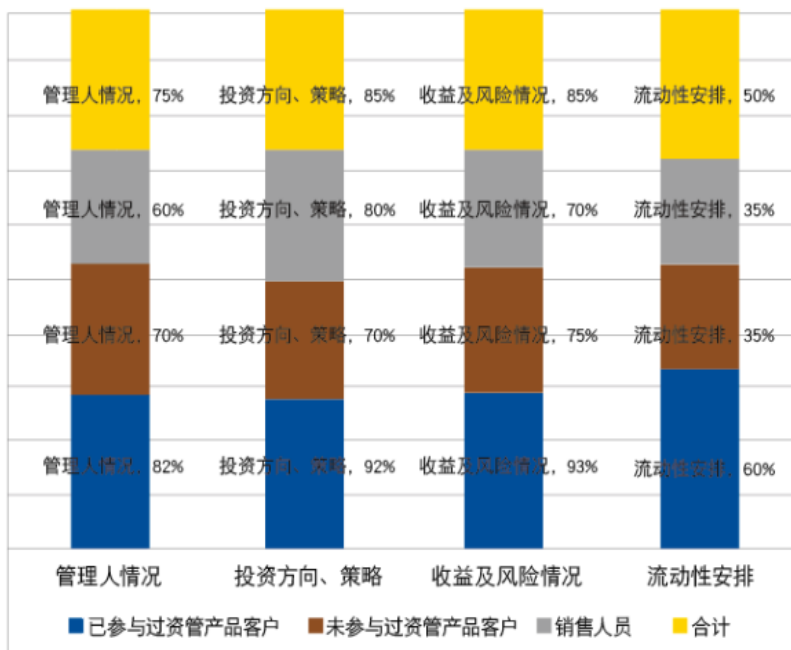
## 二、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的研制思路与方法

资管新规对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作出了统一规定，对资管产品范畴、分类、所投资产、分级嵌套，尤其是资管产品销售环节中合格投资者标准、适当性、信息披露等内容均进行了明确要求。这为制定资管行业统一要素、统一表述的产品介绍标准奠定了制度基础。

为充分了解国内外资管产品介绍要素要求，标准研制单位对欧盟、新加坡、香港等境外具有代表性金融市场的法令法规进行了调研（见表 1）。

市场	欧盟	新加坡	我国香港地区
法令法规	PRIIPs 法规、Key Information Documents (KID)	《CIS&ILPs 推介最佳实践准则》《关于向客户提供产品信息及产品信息	《产品资料概要》
主要内容	要求生产或销售投资产品的机构须向投资者提供标准化模式的 KID 文件； KID 的纸张要求，须包含的 7 部分内容，以及 KID 模板； KID 内容和呈现方式、数据的计算方	宣传和推介的文本格式、内容表述要求，涉及标题、页脚、风险揭示、业绩数据的使用等九大事项； 要求推介材料清楚、充分、正确，并提出了应向客户披露说明的 14 项信息	产品资料概要的要素至少包括产品名称及类别、发行人名称、资料便览、这是什么产品等 7 个一级要素； 对于不同类型产品分别制定不同模板
特点	KID 模板简短易读，不存在过多专业术语，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 and 比较不同 PRIIPs 产品的关键特征、风险、回报和成本； KID 一级要素多采用“我”为主语的问句形式	对产品宣传推介涉及的各方面事项都进行了细致、详尽的规定； 对标题、脚注、引用信息、业绩数据、字体等格式、样式提出具体要求	细致全面，覆盖产品范围较广； 各级要素的表述均采用白话形式

图 2 投资者最关心产品信息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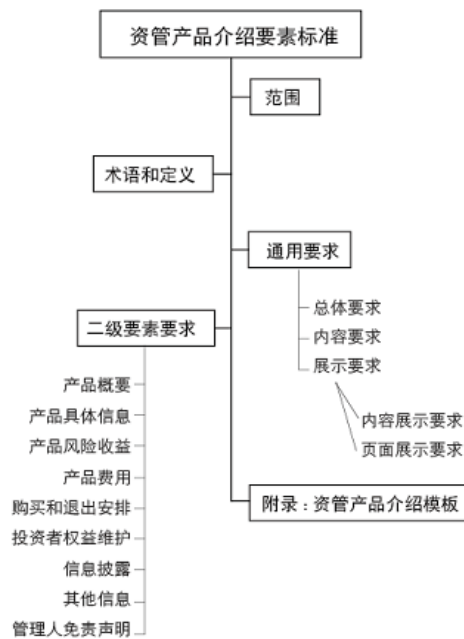
为了解境内投资者实际需求，标准研制单位对境内不同地域的投资者以及销

售人员共计 200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了投资者关注的产品要素、产品信息、资管产品介绍资料篇幅等。从统计结果看，资管产品介绍文件的篇幅不宜过多，控制在 4~6 页较为合适。最受关注的产品要素主要集中在投资方向及策略、收益及风险情况、管理人情况及流动性安排上，其中管理人情况占 75%，投资方向及策略占 85%，收益及风险情况占 85%，流动性安排占 50%（见图 2）。

### 1 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的主要内容

《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 2 部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明确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的通用要求、各级要素及内容要求，并结合实际制定《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模板，指明契约型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产品介绍文件的编制均应遵循标准（见图 3）。

图 3 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构架



通用要求包括总体要求、内容要求及展示要求。总体要求中，标准对资管产品介绍的效能予以明确；内容要求中，标准列出了资管产品介绍应涵盖的产品信息；展示要求中，标准围绕“清晰”“客观”“准确”三维度统一了资管产品介绍的纸张类型、篇幅、字体字号等要素。

在各级要素及其内容要求中，标准明确了资管产品介绍应向投资者展示的各级要素及其内容，共涉及一级要素 10 项、二级要素 49 项，覆盖产品投资服务相关机构、适当性要求、投资、风险收益、费用、投资者权益维护等关键产品信息

（见表 2）。

序号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二级要素数量
1	重要提示	给投资者的提示	1
2	产品概要	产品名称、产品代码、资料发布日期、产品简称、发售规模 / 产品规模、交易币种、成立日期、存续期限、到期日期、合同签署方式、购买起点、运作方式、管理人、销售机构、托管人、投资顾问、投资经理及介绍、业绩比较基准及确定依据	18
3	产品具体信息	产品类型、产品的风险等级、投资目标、目标客户群体、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策略、挂钩标的和收益结构、结构化安排、管理	10
4	产品风险收益	预警止损安排、主要风险及可能带来损失、需特殊关注的风险、	4
5	产品费用	产品销售 / 交易相关费用、产品运作相关费用	2
6	购买和退出安排	认购安排、封闭期及开放期安排、申购安排、退出安排、其他安	5
7	投资者权益维护	销售机构、管理人、行业协会、监管机构的投诉渠道及方式	4
9	其他信息	关联关系、产品备案情况及其他信息查询方式、其他信息	3
10	管理人免责声明	披露管理人免责条款	1
二级要素数量合计			49

相比境外市场的法令法规，我国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标准的形式对资管产品营销宣传材料做出约束的首次尝试。与法令法规不同，是自下而上的行业自发意见的集中体现。

二是标准中的要素内容均是投资者切实关心的问题。《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内容不单单是考虑要让投资者知道什么，更多的是投资者希望知道什么。

三是从《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的编制者角度来说，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简单易懂、实用性更强，明确了模板中各要素如何填写、填写什么。

四是从阅读者角度来说，符合标准的《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介绍》兼顾“清晰度”与“亲和度”。各级要素在表述上采用以第一人称“我”为主语的问题形式，并设置批注栏，通过批注将要素内容直接导向资管产品合同的相应章节、段落。在增加投资者阅读的亲和感的同时，对产品信息进行准确分类，帮助中小投资者更好的了解产品风险特征，判别与其投资目的、风险承受能力的适配性。

### 三、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的应用

在资管新规统一监管的背景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适当性管理义务的重要性和意义日益凸显。信息披露是保障中小投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落实资管

产品“卖者尽职、买者自负”理念的重要措施之一。资管产品介绍作为信息披露、销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准化工作将在资管产品的营销推介上对管理人、销售机构形成有效约束。另一方面，通过资管产品介绍要素标准，中小投资者可以获得统一标准、规范明晰、浅显易懂的资管产品介绍文件，充分了解产品类型、结构及风险收益特征，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决策。

《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 2 部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发布后，相关单位通过官网、媒体、微信等网络渠道进行宣传，借助网络直播、录播等方式推动行业落地及投资者教育工作。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该标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为促进标准与业务快速结合，规范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维护财富管理行业稳定，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监管机构强化标准执行力度。一方面，考虑建立标准使用办法或指导意见，要求资管行业及财富管理行业严格按照标准制定资管产品介绍；另一方面，加强标准执行环节的监督管理，鼓励金融机构自检自查，接受市场监督。

第二，行业自律组织协调行业机构，提高对标准实施的重视程度，促进并引导行业机构应用标准；设立试点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在行业标准落地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第三，金融机构认真执行标准，使符合标准的资管产品介绍深入每一位基层销售人员与投资者；对资管产品销售人员开展培训，促进其合法、合规、合理展业。

#### 四、结语

资管新规运行三年来，促进了资管行业市场大融合，抑制了行业乱象，保证了金融秩序的稳定。2020 年 7 月人民银行发布《优化资管新规过渡期安排 引导资管业务平稳转型》的公告，为平稳推动资管新规实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审慎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 2021 年底。《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 2 部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JRT 0215.2-2021）的适时推出，成为资管新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有力补充，有助于推动资管新规的全面落实，促进我国资管业务回归本源、稳健发展，为中小投资者财富管理保驾护航。

作者：姚前 当代金融家

来源：当代金融家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z-S9jbxBGO2Y5oOlcZnWpw>

## 财商教育专栏

### 大学生财经素养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探究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学校园贷诈骗案例层出不穷，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升级的背后是大学生群体的超前消费、过度透支行为。2020 年支付宝发布的《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中国有 6500 万“90 后”年轻人开通了花呗，在“90 后”群体中占比 40%。据央行数据显示，1.7 亿“90 后”年轻人中人均负债近 13 万元。以上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大学生群体的生活费主要来自家庭收入，当消费欲望超出了消费能力，同时对财务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时，便容易产生过度消费、进行校园贷等行为，最终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人财两空。这也表明了年轻大学生尚未树立起正确的理财观和消费观，财经素养水平还有待提升。

我国财经素养教育起步较晚，相较于国外，还存在财经教育目标不明确，实施方法不明晰等问题<sup>[1]</sup>。2016 年，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成立。直至 2018 年，该中心才首次正式发布了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的《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标志着学校和机构的财经素养教育培训体系正式出台。学校作为财经素养教育开展的主要场所，是直接提高公民财经素养最公平、有效的途径<sup>[2]</sup>。而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作为国家人才储备，在提升全民财经素养教育水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较多高校均开设了财经通识课程，以提升大学生的财经素养水平。东南大学为全校非财经院系的本科生设置了财经概论通识选修课，由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为其授课，旨在培养交叉学科型人才。财经通识课作为非商科专业学生的基础选修课，在启发财经意识、培养财经基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财经通识课程的授课群体前期财经素养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主要从家庭背景、区域发展和财经通识课程等维度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财经素养水平的提升路径及相关措施。

#### 二、数据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数据基于东南大学本科生财经通识选修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而来。该课程开设在周二和周四，供全校非经管类学生自主选修。课题组共发放 101 份问卷，通过数据清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87 份，其中男性 61 人，女性 26 人，占比分别为 70.11%和 29.89%。样本群体主要来自大一、大二和大三年级，年龄集中在 19—20 岁，占比为 62.07%。从专业分布来看，总体分布较广泛，



其中工学为主要来源，共 64 人，占比 73.56%。样本的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 （二）财经素养水平

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来衡量大学生的财经素养水平，具体体现在知识与信息、能力与方法以及态度、意识、价值观等方面<sup>[3-4]</sup>。每个角度均通过两个问卷问题来衡量，且每道题比重相同。回答选项分为“非常同意/理解/掌握/关注/了解”“同意/理解/掌握/关注/了解”“不确定”“不同意/理解/掌握/关注/了解”“非常不同意/理解/掌握/关注/了解”等五个维度，依次赋值 5—1 分。分值越高，代表财经素养水平越高。同时，本文还设置课程前后对比，以便观察财经通识课程对财经素养的提升效果。具体问卷问题如下：①财经知识与信息：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对财经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对现实问题背后的财经知识的理解程度。②财经能力与方法：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对财经基本技能（如股票、基金等投资分析）的掌握程度；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能对根据热点话题选择不同的财经知识和工具去解释和运用（花呗分期付款等）。③态度、意识与价值观：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对财经问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在上这门课程前后，你对社会理财活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有关注。

表 1 样本基础信息描述性统计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1	70.11
	女	26	29.89
年龄	18	16	18.39
	19	24	27.59
	20	30	34.48
	21	17	19.54
专业类型	工学	64	73.56
	非工学	23	26.44
合计		87	100.00

从表 2 可知，知识与信息，能力与方法，态度、意识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最小值均为 1，即有学生在财经素养的任一维度上均十分薄弱。从最大值和平均值来看，相对而言，学生在财经态度、意识和价值观上有着良好的基础，表明学生对生活中的财经问题、社会理财活动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有较多关注。综合其余两个角度来看，发现尽管学生有着较好的财经意识，但对相关财经知识和能力的掌握程度整体偏低。

表 2 财经素养水平描述性统计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知识与信息	174	1	4	2.10	0.83	2
能力与方法	174	1	4	2.15	0.95	2
态度、意识、价值观	174	1	5	2.74	1.08	3

注：财经素养水平的三个维度根据回答题项依次赋值 5-1 分，表中数值为样本组内均值。

### 三、财经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家庭背景

本研究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是否为独生子女、户口类型等维度进行了调查，具体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知，父母学历在专科及以上的共有 62 人，占比 71.26%，专科以下学历的占比 28.74%。父母学历在专科及以上的样本中，研究生学历以上的有 14 人，在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中占比 22.58%，表明样本群体家长的学历整体偏高。从工作性质来看，父母任意一方的工作与财经相关的仅为 19 人，占比 21.84%，绝大多数与财经不相关。独生子女的家庭居多，人数为 59 人，占比为 67.82%。户口类型为城市户口的学生居多，为 66 人，占比 24.14%。

表 3 家庭背景描述性统计

维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学历	专科及以上	研究生及以上	14 16.09
		研究生以下	48 55.17
	专科以下	25 28.74	
工作性质	财经相关	19 21.84	
	非财经相关	68 78.16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59 67.82	
	否	23 32.18	
户口类型	农村	21 75.86	
	城市	66 24.14	
合计		87	100.00

本研究进一步调研了学生在家庭财经活动里扮演的角色，比如询问自己是否参与过家庭理财、是否经常与父母讨论相关财经话题等问题。结果表明曾经或现在参与过家庭理财的学生人数仅 27 人，占比 31.03%，与父母经常讨论财经相关话题的学生人数仅为 29 人，占比 33.33%。整体体现出多数学生在家庭活动里参与财经相关话题的活动较少。

此外，本研究对财经素养各维度在不同的家庭背景变量下进行了分组统计，具体结果见表 4。可见，父母学历对学生的知识与信息、能力与方法有着负向作用，而对态度、意识、价值观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结合家庭财经相关活动的参与度发现，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经常参与家庭理财讨论，却较少地参与实际的家庭理财活动。总体表明父母的学历水平会提高自身的财经价值观和意识，从而在家庭活动如讨论家庭理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而知识与信息、能力与方法较多地需要通过个人实践而获得，父母学历越高，孩子的实际参与必要性相对更低，从而导致父母学历对其有负向作用。从工作性质来看，若父母的工作与财经相关，孩子财经素养基础显著偏高，家庭理财活动参与度也较高，表明父母的工作性质对孩子的财经素养基础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如果学生为独生子女，参与家庭理财讨论活动偏多，实际参与家庭理财活动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相差无几。但在财经素养方面，知识与信息、能力与方法偏弱，态度、意识和价值观偏强。相比于独生子女家庭，相同经济状况的非独生子女家庭所要承担的花费更大，孩子会自发践行理财活动，从而提高了理财能力和丰富了理财知识<sup>[5]</sup>。但因家庭理财讨论活动较少，相对而言，孩子缺少价值观层面的熏陶。户口类型方面，农村户口的学生会更多地参与家庭理财活动，在能力与方法维度上也较城市户口的学生更为突出，但在态度、意识和价值观层面会较弱，这种情况和独生子女家庭类似。

表 4 家庭变量分组分析

维度	选项	家庭理财参与	家庭理财讨论	知识与信息	能力与方法	态度、意识、价值观
父母学历	专科及以上	0.29	0.35	2.08	2.10	2.83
	专科以下	0.36	0.28	2.14	2.26	2.52
工作性质	财经相关	0.32	0.37	2.11	2.21	2.84
	非财经相关	0.31	0.32	2.10	2.13	2.71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0.31	0.42	2.06	2.06	2.87
	否	0.32	0.14	2.18	2.34	2.46
户口类型	农村	0.38	0.33	2.10	2.29	2.55
	城市	0.29	0.33	2.10	2.11	2.80

注：“家庭理财参与”和“家庭理财讨论”均为 0/1 变量，表中数值为样本组内均值；财经素养水平的三个维度根据回答题项依次赋值 5-1 分，表中数值为样本组内均值。

## （二）区域发展

本研究通过搜集调研群体的家庭住址（省市数据），从而匹配到每个学生所处省份的 GDP 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在校大学生数量等数据。表 5 为全样本的 GDP、在校大学生和第三产业的描述性统计。在所有样本中，GDP 最大值为 73

756.49 亿元, 最小值为 1028.56 亿元, 表明样本群体的家庭所处区域的经济发  
展程度差距较大。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小值为 1595.4, 最大值为 5437.5, 均值为 264  
7.67, 表明每十万人中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为 2647 人。第三产业占比最高  
为 78%, 最低为 38%, 整体跨度较大。

表 5 全样本地区变量描述性分析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GDP (亿元)	87	1028.56	73756.49	33464.41	29284.11
在校大 学生(人)	87	1595.4	5437.5	2647.67	2355.50
第三产 业占比	87	0.38	0.78	0.46	0.45

注:GDP 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在校大学生指每十万人中高  
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第三产业占比为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  
业增加值/GDP),以上指标均为 2010—2019 年各省份的均值。

此外,本研究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类标准,将区域划分为八大综合  
经济区<sup>①</sup>,包括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  
区、大西北地区 and 东北地区。表 6 为八大经济区域的 GDP、在校大学生和第三  
产业变量描述性统计。其中,样本分布集中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以  
及长江中游地区。以上区域的 GDP 均在 25000 亿元以上,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  
GDP 最高,达 62762.68 亿元,而这也是样本群体最集中的地区,占比 26.44%。  
在校大学生人数中,北部沿海、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区域居前三,大西北地区人  
数最少。从第三产业占比来看,北部沿海地区的占比最高,达 50%,黄河中游地  
区占比最低,仅 41%。

表 6 八大经济区域数据分析

名称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
频数	16	23	7	13	10	8	7	3
GDP(亿元)	28393.41	62762.68	26779.96	25529.73	26168.69	19722.40	5128.64	12951.62
在校大学生(人)	3351.17	2789.96	2336.91	2456.94	2444.58	2125.43	2038.71	2846.97
第三产业占比	0.5	0.48	0.46	0.41	0.42	0.44	0.46	0.43

本研究从八大经济区域的角度来观测财经素养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如表 7  
所示。首先在知识与信息方面,黄河中游与北部沿海地区名列前茅。其次在能力  
与方法,态度、意识和价值观两个维度上,东部沿海均居首位,初步表明在经济  
较发达地区和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其大学生解决财经问题的能力和财经意  
识会更强。大西北地区虽然在校大学生人数及 GDP 水平均居末尾,但财经素养  
的三个维度得分情况均居前列,表明在经济越不发达和越发达两个层级的地区均  
会有较高的财经素养水平,整体体现出了一种 U 型关系。

表 7 八大经济区域财经素养维度分析

名称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
知识与信息	2.22	2.04	1.93	2.23	2.05	2.06	2.07	2.00
能力与方法	2.25	2.26	2.07	2.12	2.15	1.94	2.07	1.83
态度、意识、价值观	2.34	3.33	2.64	2.77	2.60	2.44	2.79	1.67

注：财经素养水平的三个维度根据回答题项依次赋值 5—1 分，表中数值为样本组内均值。

### （三）财经通识课程

在了解学生财经素养基础的同时，本研究通过设计课前和课后两个维度来考查财经通识课程对学生财经素养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8 所示。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参与财经课程之后的平均值从 2.10 提升至 3.86，上升了 83.8 个百分点，中位数从 2 提升至 4，表明财经课程能够提高本科生的财经知识掌握程度和提升财经信息解析能力。在能力与方法方面，参与财经课程之后的平均值从 2.15 提升至 3.62，上升了 68.37%，中位数从 2 提升至 4，表明财经课程能够提升本科生的财经工具与方法运用能力。在态度、意识、价值观方面，参与财经课程之后的平均值从 2.74 提升至 4.02，中位数从 3 提升至 4，表明财经课程能够增强本科生的财经敏感度以及塑造财经价值观。总体而言，财经通识课程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财经素养。

表 8 财经通识课程对财经素养的影响

名称	课程前后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知识与信息	前	1	4	2.10	0.83	2
	后	1	5	3.86	0.53	4
能力与方法	前	1	4	2.15	0.95	2
	后	1	5	3.62	0.80	4
态度、意识、价值观	前	1	5	2.74	1.08	3
	后	2	5	4.02	0.67	4

注：财经素养水平的三个维度根据回答题项依次赋值 5—1 分，表中数值为样本组内均值。

## 四、财经通识课程视角下财经素养的提升对策

### （一）政府出台系统的财经素养教育政策

我国财经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存在地区资源分散、课程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系统的财经素养教育政策，设立专门机构，整合多方资源，结合各方力量，联动银监局、保监局、央行等多部门协作，以确保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和落实。具体可围绕农村学校和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维度着重推进。一方面，目前农村学校的财经素养教育资源仍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如配置专门的教师资源和提供扶持资金等；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学校财经素养教育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碎片化、浅层化等问题，因此需不断完善财经素养教育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协同推进多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共同发展的财经素养教育。总体而言，政府应深化财经素养教育理论，在引领、加强和规范财经素养教育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 （二）学校实施系统化的财经素养教育活动

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主体，可通过系统性的教育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掌握财经相关知识以及提升财务管理能力。财经通识课作为高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体现的是人性教育，它将帮助学生从劳动的视角理解人性，理解社会共同体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sup>[6]</sup>。因此，财经通识课程应结合思政教育，以价值观培育为基础，通过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和培养高度的财经敏感度，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可在课程中设置贴近生活的财经实践活动，通过模拟实验、案例讲解、财经比赛等活动，激发大学生对财经素养学习的兴趣。同时建议课程内容的设置应多样化、全面化，通过覆盖收入、消费、风险、投资、税收等内容，引导学生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 （三）家庭辅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消费观和理财观起着不容忽视的辅助作用。随着家庭生活品质的提升、互联网支付的便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能够提前接触到日常财经决策。如何帮助孩子提高财经素养水平从而做出正确的财经决策，父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应重视孩子的财经思想教育，让其明白劳动与报酬、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教导其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第二，父母应正确定位孩子在家庭理财中的角色，如在家庭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通过设计信息的获取、目标的设定、方案的选择和结果的评价等环节，让孩子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培养其实际操作能力。第三，家长应不断提高对财经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自身财经素养水平的同时，和孩子定期开展家庭财经活动，以此达到持续有效的输出与反馈。

##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家庭背景、区域发展和学校财经通识教育等因素影响大学生的财经素养水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其财经素养教育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未来需在政府、学校和家庭等多方努力下，不断提升大学生的财经素养水平，为祖国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 陈洪涛, 安茂琳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 《高教论坛》, 2022, (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frwrmZ44VirsrOrLKfHA4Tt0NYeKFCEdq%2B7ZufliKcC1Y%2BcK0L8S6C4foDZ6CmHFRMuYw7jJ2M%2Fjg34QrZgpCpvHEh3ntY7cRV%2Fng5gsXSo8IjPG%2BIAc1%2FXoKnajY71uU%2FPJXkveV%2FJrJ7XaKjZOyGz8yj3qoLLhbBAxZSAQQuB0%3D&DBC CODE=CJFD&FileName=GGJY202202015&TABLEName=cjfdauto&nonce=27298CF3F5435C904E27B127E2E054&uid=&TIMESTAMP=1647394313359>

##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以《金融工程学》课程为例

2020 年初疫情期间,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全国高校大规模开展线上教学,老师们都体验了从紧张、到兴奋、再到从容的心路历程。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教师们已经发现传统的课堂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学习的需求。雨课堂依托微信,凭借其方便灵活的特点被广泛使用。研究以《金融工程学》课程为例,讨论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及其实践。

###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概述

一般而言,混合式教学没有统一的模式。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归根结底是要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实现有效教学。为了实现混合式教学的终极目标,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改革,教师要首先保证线上有资源,线上资源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前提条件。教师可以将传统的课堂讲授内容录制成微课等短视频,将提前准备好的微课视频推送给每一个学生。学生有充分的时间预习后,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充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这样,教师在课堂上有充裕的时间讲授重点难点,或是解答一些同学们预习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问题。

首先,我们使用的“金融工程学”课程教材是郑振龙教授和陈蓉教授所著的《金融工程》(第五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两位教授的“金融工程”慕课已在“中国大学 MOOC”上线。这是《金融工程学》混合式教学极好的线上资源。该慕课将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通过问题导向式教学,引导学生观察现实,洞察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差异;通过本土化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教材与课程配合学习,可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其次，教师还要做到线下有活动，即线下的课堂教学要能够检验和巩固学生线上学习成果。在线上学习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确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是什么，例如在给无红利资产远期期货合约定价时，首先要明确告诉学生最终需要掌握的是一个定价公式，该公式中各个字母代表什么一定要清楚，难点是该公式是如何得出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那么线下课堂教学时，可以用雨课堂习题推送功能，首先让学生做几道题来检验线上的预习效果，或者用翻转课堂的形式让学生讲解公式中蕴含的原理，然后教师点评总结，答疑解惑。这样的教学活动应当是高效的，因为可以避免教师讲授过多而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低，参与度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点灵活应用。

第三，教师要做到过程有评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都需要教师及时进行评估。可以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或者其他的应用开展小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及时调整授课节奏和方法。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学明白的同时，也可以让教师教得明白。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线上教学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锦上添花，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线下教学不是传统课堂的照搬，而是作为线上教学的延展而进行的更加深入的教学。混合式教学重构了传统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拓展。

## 二、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课前，任课教师可以将教学 PPT 等预习资料上传到雨课堂，发布到相应班级，学生可以自学其内容。课中，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自学反馈及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等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讲解及测试。课后，学生可以在雨课堂中完成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答题情况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基于雨课堂混合式教学设计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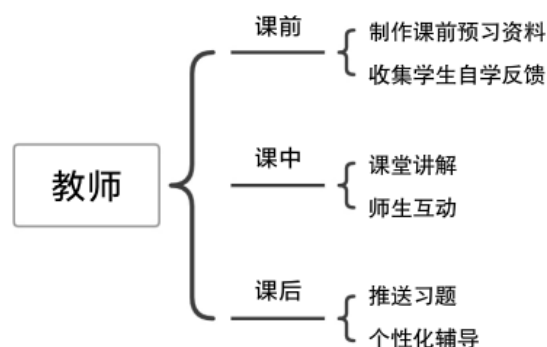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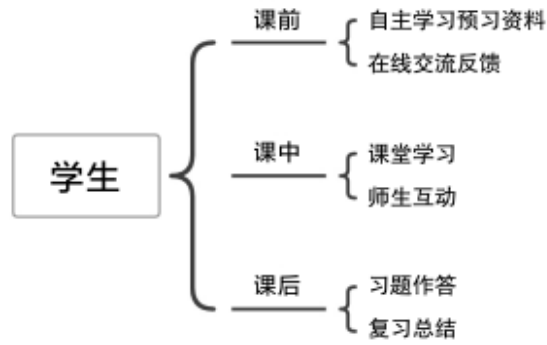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 三、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 （一）《金融工程学》课程的特点

《金融工程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具有一定的难度。该课程综合了现代金融学、计算机、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的知识。课程主要内容是衍生产品的定价及其运用，包括远期期货的定价及其运用、互换的定价及其运用、期权的定价及其运用等等。

#### （二）《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1.课程难度大，学生容易望而却步

由于《金融工程学》课程涉及到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定价及其运用，再加上其极强的综合性特点，使得该门课程对于学生来说颇具挑战性。如何充分调动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是任课教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2.学时有限，教材内容相对较多

课程难度较大，再加上教材内容较多，使得本不充裕的授课学时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使学生学习并掌握尽可能多的教材内容，也是授课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 （三）基于雨课堂的《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活动过程

##### 1.课前

课前将预习资料通过雨课堂发送给同学们，使学生明确即将学习的知识内容的教学目标与重点难点。同学们可以利用通过雨课堂收到的资料进行预习，从而在课堂上更能有的放矢地听课，提高听课效率，达到有效学习和高效学习的目的。

《金融工程学》主要内容为给金融衍生品定价以及金融衍生品的运用。在郑

振龙教授的《金融工程》（第五版）教材中，第三章的内容为给远期与期货定价。在给远期和期货定价时，把标的资产分为无红利资产、分发已知现金红利资产和已知红利率资产。根据标的资产在远期期货合约到期前，是否产生红利以及产生何种形式的红利，该远期期货合约的定价公式有所不同。在讲解无红利资产远期期货合约定价之前，通过雨课堂将第一章学习过的复制定价法和无套利定价原理的学习资料发送给学生，使大家及时回顾该重要知识点，这样可以节约本不充足的学时。在讲完无红利资产定价后，讲解已知红利和红利率标的资产远期合约定价前，通过雨课堂将该部分内容发送给学生，使得学生提前预习，有一部分同学能够通过自学初步掌握已知红利标的资产远期期货合约定价，大部分同学能够通过自学初步掌握已知红利率标的资产远期合约定价，从而在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解答大家的疑问，突破重点难点。这样，学生们可以体验到学习带来的成就感，达到有效学习的目的。

## 2. 课中

### （1）扫码签到

雨课堂提供了扫码签到考勤功能。上课前，教师打开教学 PPT，点击 PPT 中的“开启雨课堂授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课程和班级”点击开始授课，之后屏幕会出现课堂二维码。学生使用微信扫描该二维码加入课堂，此时屏幕会显示已经加入雨课堂的学生数量。

### （2）课堂互动

利用雨课堂，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更多有趣的、高效的课堂互动。互动形式包括教师随机点名、学生不懂反馈、教师限时推送习题、学生弹幕投稿等。

第一，雨课堂具有随机点名功能。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在手机屏幕右下角的“更多”中选择“随机点名”。通过雨课堂的随机点名功能让学生回答问题。

第二，雨课堂具有限时推送习题功能。如果说随机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考察的是个别同学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那么限时推送习题则是考察全体同学的学习情况。课前教师可以在 PPT 中插入习题，当教师授课到提前制作好的题目页时，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设定好学生答题时间，然后点击“发送此题”，发送当前习题。教师发送习题后，学生手机端出现蓝色的题目提醒，点击即可作答，教师可以查看题目作答情况，包括学生给出的答案和答题时长。限时发送习题功能可以让教师掌握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情况。学生作答完毕，教师即可查看结果。例如多选题的结果中包括各种错误结果及对应的做出该错误选项的学生，包含未答题

人以及回答正确的学生名单。教师可以针对错误率较高的选项给出更加详细的解释，该功能特别有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金融工程学》课程中，教材第二章为远期与期货概述，教师在 PPT 中插入了两道多选题，第一道题目为场内交易的衍生品有哪些？四个选项分别为 A 远期、B 期货、C 互换、D 期权。这道题目回答正确率为 86%。第二道题的题目为场外交易的衍生品有哪些？四个选项分别为 A 远期、B 期货、C 互换、D 期权。此题回答正确率为 0。显然，学生对于金融衍生品期权的掌握情况不如远期和期货好。同时也反映出学生预习情况不好，因为书上在第二章中明确写出，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包括远期、互换和期权。所以教师可以强化期权的基本知识，同时强调由于本门课程难度较大，课前有效预习是很必要的。

第三，雨课堂具有不懂反馈功能。学生通过手机微信里的雨课堂公众号，查看教学 PPT。学生接收到的每一页课件下方，均有“不懂”和“收藏”两个选项，如果对当前页面有疑问，可以随时点击“不懂”，进行匿名反馈。教师可以在“缩略图”中查看学生不懂反馈数量。该功能也可以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情况。

第四，雨课堂具有弹幕投稿功能。教师开启雨课堂授课，学生进入雨课堂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即可以进行发送弹幕或投稿，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交流。

### 3. 课后

课后教师可以查看学生设为“不懂”的 PPT 中的相关知识点，设计相关题目，将有助于理解这些知识点的题目及作业运用雨课堂推送给学生，以此检查学生对这些知识点和课程重难点内容的理解掌握程度。

一堂课结束授课后，雨课堂中形成的课堂回放、课堂课件、课堂互动和所有教学活动数据，可以用来解决学生复习的问题。雨课堂中形成的教学资源是宝贵的财富。一学期结束后，所有教学活动都会沉淀下来，自动完成一门课程的建设 and 数据留存。雨课堂中留存的数据将是授课教师最好的帮手。教师可以结合预习数据，调整授课内容；结合课堂数据，调整课堂设计；结合复习数据，调整授课内容；结合学情数据，优化教学设计，评估教学质量。总而言之，教师可以运用雨课堂，做到全过程和全方位评价教学。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李美丹 哈尔滨金融学院金融系

来源：《金融理论与教学》，2022，（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oCe5uKPQM18Yq%2B%2FCqlpdcYDVkFhpnk4WYirs5C54q2kcj7xVOt1x1SiC97DJDiwD0sJgha3%2F3pIHRBHBnNcz2RQFhw9UgpGKKyxi%2FLw%2FKrN65VFOTJPtXUHAcgrRbB1cOTPUAKz5NRFM9GfNn4KvH%2FnnM9mkybgsRB%2FAn9gU9Ho%3D&DBC CODE=CJFD&FileName=JRJX202201018&TABLEName=cjfdauto&nonce=BE751704CEF64C47A4D91AD42B457CC1&uid=&TIMESTAMP=1647396814500>

##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推陈出新。社会变革时代往往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双一流的推进为推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专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这种背景下,“新文科”概念应运而生并深入人心。财经类高校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平台,集经、管、法、文等多学科于一体,具有典型的学科交叉、专业融合的特征,对于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新文科建设的背景及现状

2018年,《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高等教育要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四新建设<sup>[1]</sup>,这标志着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的适时应变之举<sup>[2]</sup>,成为了文科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sup>[3]</sup>。很显然,新文科建设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新发展理念融入传统的人文社科专业中,强调学科交叉与融合,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培养一大批思想开放且综合素质较高的高层次人才,为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文社科专业奠定基础。

新文科建设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施的重要战略,目前其研究正处于从认识论向方法论、从宏观向微观的重要转变阶段<sup>[4]</sup>。从近代开始,知识生产体系以分化性为基础,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各类学科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sup>[5]</sup>,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使得高校在日常的专业建设、教学科研中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典型特征,学科分割严重阻碍了不同类型的专业之间的交流合作。21世纪以来,随着新教育理念的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同学科之间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趋势,新的专业、新的领域、新的学科不断出现。在人文社科专业中,财经类专业最为接近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数据分析、计量方法、实证研究等工具的应用普及为人文社科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而财经类高校作为培

养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前沿阵地，始终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要使命。由于财经类高校汇集了人文社科中的大部分专业，一些财经类院校也开设了理工科，使得财经类高校具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天然优势，这与新文科建设的理念高度契合。然而，长期以来传统的人文社科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过度强调理论知识的积累，忽略了学生科研创新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导致广大学生难以真正实现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因此，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大力提升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内容。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新文科建设也在高等院校蓬勃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专业设置上加快建设交叉学科，尤其是涉及到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并将传统的人文社科与新领域有机结合。例如，浙江财经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相继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山东财经大学增设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交叉学科的设置颠覆了高校传统的专业基础，优化了专业结构和学科方向，展示了新文科建设的新理念。第二，在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上更多地发挥多学科优势，打造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平台。随着高质量发展、气候变化、碳中和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推进，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再是单一的发展问题而是多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不少高校在设立新的专业基础上整合研究力量，搭建高水平科研融合平台。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碳中和发展研究院等，高端智库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在人才培养上加强复合型复合人才的培养。事实上，文科专业占有所有学科门类的一半以上，文科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断完善人文社科类的人才培养工作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文科建设着眼于应用性复合人才培养，将打造复合型文科人才作为切入点和落脚点。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将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引进教材和课程中，在人才培养上加强校企合作、国际交流，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 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践创新问题剖析

### （一）本科生对实践创新认识不足，缺乏参与实践创新的热情

中国大学对于本科生的教学考核是以“通过”为主而不具有“选拔”的目的，特别是社会科学专业过度强调理论知识的积累，使得不少本科生仅仅注重理论学习而放松社会实践，同时，现行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只需要通过死记硬背便可轻松通过考核，这与新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新文科建设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僵化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不仅导致本科生只重视课本学习和理论知识，而且轻视了科研创新、社会实践在自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虽然近年来不少财经类高校将大学生实践创新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但在平台搭

建、教师指导、资金支持方面依然不足。

首先，新文科建设强调多学科交叉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也强调数据的定量分析与人文视野相结合，但就本科生创新实践活动而言，由于多数财经类高校缺乏社会科学实验室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导致本科生实践创新活动缺乏基本的平台保障。近年来大量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活动的举办与开展，凸显了进一步建设社会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其次，本科生导师制是近年来财经类高校实施的一项举措，通过借鉴研究生导师制，让本科生更多地参与到导师的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过程中，从而强化对本科生的日常监督与培养，其目的在于提高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校老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同时也要主持或参与大量的横向纵向课题，大多数高校教师的精力和时间比较有限，很显然，在本科生参与各项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指导教师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少高校师资匮乏以及约束机制的缺乏，指导老师的作用较为有限<sup>[6]</sup>。

## （二）激励奖励机制不健全，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本科生创新创业和实践创新活动，在资金、师资等方面给与了大力支持，各级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有关部署，不断扶持和引导本科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但由于缺乏完善有效的激励奖励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果。首先，尽管国家和省级层面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但项目的名额比较有限，而且更加倾向于 985、211 工程院校，因此，财经类普通高校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受限于自身资金和学科的限制，财经类院校往往不能获得来自国家和省级层面的大学生科研项目支持，自身也没有充分实施针对本科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的项目计划，这极大地影响了本科生实践创新活动的开展。当前，一些财经类高校不重视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少高校给与本科生实践创新活动的条件和资源都比较简陋，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生培养方面，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科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的资源，导致其实践创新能力和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较为薄弱，眼界不够宽阔，无法与社会深度接轨。其次，尽管一些高校将实践创新纳入到本科生评优评奖和升学留学的过程中，以此激励本科生参与创新创业和实践创新的热情，但是，不少高校没有制定专门的本科生科研创新和社会实践的方案，在政策方面没有给与必要的引导，使得本科生对于参加实践活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或者有偏差，现行的实践创新激励奖励方案也不灵活多样，往往单一地给与奖金或者加分支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近年来，数学建模、挑战杯、“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的举办和推进，为本科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但由于缺乏科学灵



活的激励体制和培训模式，使得广大学生有想法但无处实施，因此，无法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 （三）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实践创新活动存在形式主义

近年来，由于国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鼓励本科生积极参与到各种项目和活动中，无论是 985、211 工程院校还是普通院校，相应的学科竞赛、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层出不穷，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丰富学生日常生活。然而，在财经类高校举办实践创新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得多数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流于形式。一方面，由于缺少专业指导老师的支持，不少学生在参与实践创新活动的过程中认识不够，没有系统规划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方案，往往只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意规划或者安排活动进程，最后的结果总是不了了之。例如，在“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少大学生利用暑期实践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调研，但可能事先既不会规划路线、日程，也不会与相关部门联系，最终只是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完成一份实践报告，显然，这样的实践和成果没有太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学校层面对于学生实践创新活动的管理和支持方式不到位，也不合理。多数财经类高校仅仅只是给学生布置实践创新活动后就不再参与到其中。事实上，财经类本科生的实践创新活动往往与金融、证券、农村等直接相关，而试图真正深入参与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实践中，必须得到学校的主动帮扶，但多数高校的制度不健全、要求不具体，使得多数实践创新活动浮于表面，学生只要交一份实践创新报告即可完成任务乃至参与评优评奖，无法真正让大学生从中受益。

## 三、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践创新的路径选择

### （一）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参与实践创新的热情

长期以来，高校的教学模式过度强调知识的输入和理论教学，把实践创新与理论知识割裂开来，大学生实践创新和课程教学存在一定的鸿沟和差距，一些老师甚至认为创新创业活动和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作用不大，而理论知识的积累和课程学习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由于大学生刚从辛苦繁重的高中生涯走向大学，加上高校教学纪律相对比较宽松，不少学生也不会真正沉下心接受理论学习。特别是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由于多数课程主要依靠书本等传统课堂，实验和实践形式的教学课程较少，因此，进一步鼓励大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十分必要。

激发学生参与实践创新必须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当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把课堂搬到课外校外。财经类高校的教师往往承担和负责一些企业、政

府以及金融机构等部门的课题项目，便于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创新活动中。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和科研创新方面，导师的作用不容忽视，要加强本科生导师或者任课教师在大学生实践创新上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开始实践创新活动，让学生认识到实践创新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新文科强调开设一批新课程，运用新模式、新技术来教授新的知识。财经类高校应当开设“双创”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不仅教授关于实践创新方面的理论知识，打牢学生的理论基础，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线下课下的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感受到实践创新的快乐和过程，从而激发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的乐趣，不断提高大学生参与实践创新的主动性，更加积极地学习相关知识并参与其中。

## （二）健全激励奖励机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新文科背景下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大学毕业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这离不开实践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但高校欠缺新颖的培养举措与方式<sup>[7]</sup>。因此，必须全面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奖励机制发挥大学生的实践创新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新文科强调培养跨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由于专业设置和教学科研主要集中在经、管、法等学科，必须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吸收理工科以及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的内容，适当开设一些相关课程如统计、数学等基础性理科课程，进一步加强与理工科等高校的合作交流，促进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从单一专业型向综合多学科方向转变，全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节选自《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龙小凤，杨鹏，谢一宁，刘佳毓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39（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RusrNnoApk0Sw9d9nekUJu1aBAjuhNkwiCdy8hVB9FSy%2FtTORjShs6kDcI2yTyJ1uOAmsyf%2Fs66esjnh%2FX8HIqFRJqkUAlgvmwqLRw00YZ38LlqbhaLSSN%2BoG5H6L%2Bc5KOnX9ddy56B86gFb24hMGowlJmi%2BzjAksZ8EB1m8c4%3D&DBC CODE=CJFD&FileName= LDSZ202201019&TABLEName=cjfdlast2022&nonce=E9C275BA95DF44BC918B76D192388048&uid=&TIMESTAMP=1647399531781>

## 公益慈善专栏

### 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

#### 一、引言

在脱贫攻坚战中第三次分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脱贫时代，第三次分配不仅要补充和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而且，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更加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正在从以物质文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传统社会，逐渐转向为以第三次分配为历史契机培育高水平精神追求的美好新社会。然而面对实践的飞速发展，现有理论却存在明显不足，尽管当下学界正热议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从哲理视角出发厘清并诠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则显得极为薄弱，实质是对其背后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思考的不足，且存在着制约政策与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可能。因而，需要聚焦以慈善事业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深入探讨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哲学根基到底是什么，其科学性何在。

当前中国发展逻辑的转变势必带来慈善逻辑的改变。在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前，慈善的理念与实践很多是围绕扶贫济困展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慈善实践也应该转换新的时代内涵。因此，需要积极寻求新的理论支持，特别是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的核心价值。坚持问题导向会发现，传统慈善理论脱胎于农业文明，核心是基于怜悯、同情，但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基于怜悯、同情的捐赠将不是以新生代为主体的捐赠主流。

#### 二、理论基础

从历程上看，基于共享理念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起落并历经多轮的理论探讨。从学科领域上看，“共享”也经历了从单纯的经济伦理到政治理念指导下全新慈善理念的转变。共享不是简单的富人财富向弱势人群的转移，而是有其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共享发展的成果，也包括在第三次分配过程中，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能够创造共享价值。当前，要厘清中国特色慈善理论，了解第三次分配就显得至关重要。分析已有的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数据库(CNKI)文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次分配”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的积极引导下形成的。在 1990 年之前，国内就已经对“第三次分配”一词进行了研究，但是彼时的“第三次分配”在内涵上与今天差别甚大，更多的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尝试，比如，它关注的是“关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方案的探索”。<sup>[1]</sup>

从作为一种新的现代经济伦理的具体提出上看，第三次分配是由经济学家厉

以宁先生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与未来经济改革走势而率先提出，它属于中国本土知识界的一种理论自觉与创新。早在 1991 年《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厉以宁先生就首次提出道德力量是“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sup>[2]</sup>1994 年，在其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次分配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第三次分配，即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也与政府的强制无关”。<sup>[3]</sup>今天所研究的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也起源于此。但是，这时的慈善事业还没有真正扎根中国改革实践，也由于国内相应经济体制转轨的困难，使得第三次分配并未引起关注且逐渐陷入沉寂。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随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国内有关第三次分配探讨的声音逐渐增多，因此在 2006 年左右，迎来了国内第一次围绕第三次分配进行热议的小高峰。此间，公共物品、捐赠机制、爱心、基金会、社会工作者、NGO 等概念以及关于财税制度等相关法律与机制的探讨逐渐进入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视野。国内有关社会组织与公益慈善的理论探讨也由此蓬勃兴起，但同时，针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有学者专门强调“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应当以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理论为指导”，“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群众的关系理论为指导”。<sup>[4]</sup>为了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人们开始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工具思考其核心原则。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sup>[5]</sup>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分配”载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原则为开拓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尤其是，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系列政策文件表明，国家已经在上层建筑、顶层设计方面明确了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框架之下指导中国的慈善实践，而且不同于西方的慈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要以共享理念为指引以服务、促进、指向共同富裕。

### 三、文献述评

目前，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方兴未艾，整体上，理论界对中国特

色慈善理论思考也才逐渐展开。尽管研究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的核心价值观与理论构建的研究还偏薄弱，持有的观点与视角也不同，但是仍然能够从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工具的若干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比如，蔡晓良、余娴丽认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西方社会组织理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导。<sup>[6]</sup>徐俊峰、葛杨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享思想，强调了它消除资本主义“人的异化”逻辑起点、私有制扬弃的逻辑内核与多层次的共享形态。<sup>[7]</sup>彭柏林则从志愿服务的视角给出了共享伦理的三个基本要求：人民利益至上、尊重人民的主体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sup>[8]</sup>纪晓光从管理哲学层面将社会共享发展的核心诉求界定为“发展正义和分配正义”。<sup>[9]</sup>马立志则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出发，将共享视为重要的公共性价值。<sup>[10]</sup>

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自身，学界已有的研究数量较少。王婴、唐钧立足于世界慈善史，以此提出一般的慈善—福利模式，并通过比较欧陆、中国香港、美国等慈善模式的不同，取各家之长总结归纳出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慈善模式。<sup>[11]</sup>彭柏林、陈东利认为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可以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念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等五个方面加以把握。<sup>[12]</sup>王宁认为可以基于“公共善”的慈善爱国思想，以此建构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理论体系。<sup>[13]</sup>

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比如，面对慈善的发展如何解决资本逻辑下对人的异化，卢德之则提出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在于共享，这也应该成为资本的新目标，尤其是，21 世纪是一个必须用共享治理资本的时代，而慈善则是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sup>[14]</sup>谭泓不仅认同慈善是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且认为需要从促进城乡、地区与民族共享发展，促进阶层之间理解、互助与共享发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共享发展等三个维度，把握新时代慈善事业与共享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sup>[15]</sup>刘建武则着眼于习近平共享发展思想的完整体系，认为它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不仅回答了共享的覆盖面与基本内容，而且回答了实现共享的基本途径和具体进程。<sup>[16]</sup>郑功成甚至明确提出要让慈善成为共享发展的长久稳定机制。<sup>[17]</sup>

总体而言，广义上的“第三次分配其实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分配范畴，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sup>[18]</sup>它着眼的是人的需求层次与全面发展。从狭义上看，以第三次分配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慈善更多聚焦于分配如何在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情境中进一步实现公平性与正义性。而“共享”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之下的全新

原则，它与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之间的交叉研究涉及领域众多，必然具有不小的理论难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sup>[19]</sup>归纳发现，强调公平正义是共享的核心与认为慈善事业是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机制的观点，为大多数学者们所普遍认同，但仍需进一步破题。此外，面对已有的文献研究少且不够深入透彻的现状，有学者也开始积极回应，“没有科学的理念，不可能有合理的慈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促成慈善事业大发展。”<sup>[17]</sup>因此，为推进研究需要深化对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思考与论证。

#### 四、概念界定

阐明基于共享理念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需要把握如下三个核心概念：

一是共享理念。指向公平正义的共享理念古已有之，但不同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共享的内涵与时代特征不同。区别于西方慈善指向的“改良主义”，本文所研究的以第三次分配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所基于的共享理念，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享思想。它既非农业文明时期的朴素共享，也不是工业文明时期的资本虚假性共享，它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扎实迈进，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一种新理念。具体来看，共享理念强调的是创造共享价值，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包括捐赠方在第三次分配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sup>[20]</sup>据此可以得出共享理念的两个基本要素：“以人民为中心”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此外，共享理念还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二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实践范畴，广义上看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思考，狭义上看则是专指慈善捐赠与志愿服务，当然后者是从前者中脱胎而来。因此，需注意第三次分配具有的丰富内涵与特征，对此学者们都积极贡献出自己的理论智慧，比如，王名等主张不应将第三次分配窄化为公益慈善这一狭窄领域和慈善组织单一主体，而应扩展其内涵，将之界定为丰裕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并达成人民美好生活的命题。<sup>[21]</sup>这种从人的需求与存在出发的研究视角，也为我们对共享理念进行哲学阐释提供了极大的启示。

三是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最终归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尽管没有给出共同富裕的基本定义，但是却给出了共产主义总的指导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学者们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的伟大构想，比如邱海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其物质前提与制度前提，同时，还具有实现的历史性。<sup>[22]</sup>李实、

詹鹏则进一步认为,需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理解共同富裕内涵。<sup>[23]</sup>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并结合国情世情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sup>[24]</sup>从内容上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sup>[24]</sup>

## 五、共享理念是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核心价值

区别于西方慈善只是对社会痼疾进行“改良”而不能“治本”,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坚持以共享理念作为核心价值以此助力共同富裕。纵观东西方哲学史中的共享思想,不论是中国的“天下大同”构想与利他主义传统,还是西方从正义论、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等视角探讨,都往往停留于一种美好向往而科学性不足。换言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25]</sup>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历史与逻辑一致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共享理念作为一个有现实依据的社会意识,它如同以往一切观念一样并不具备独立的历史,事实上,它们都是客观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与生产力水平的反映。自此,共享理念就不再是一种理论“隐喻”,更不是福利国家理论共享观的“翻版”,实际上它来自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在现实性上是能引领以第三次分配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价值取向。

### (一) 逻辑起点:共享理念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审视

哲学史上,人如何创造生活和历史即“人的存在”,始终是哲学家与社会学家探索的永恒主题。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问题,费尔巴哈明确了哲学的时代使命与命题,强调“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是哲学的最高原则”<sup>[26]</sup>与“人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与人的共同体存在是同一个命题。”<sup>[27]</sup>马克思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25]</sup>同时,他还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探讨人类生存之道的纾困。当然,不论是“社会的人类”还是“现实的人”,都是马克思哲学出发点的不同表达。考察社会历史形态的变迁,马克思认为“原子化”或“孤立”的个体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产物,“社会的人类”或“现实的个人”作为感性实在,一方面饱受资本主义的“异化”之苦,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现存境遇并蕴藏自我完善的内在的普遍超越性,是这两个方面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节选自《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罗叶丹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2，（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VHMORk5zy76nEWByVU1SU M0ogBSmEESzRUybk4DAN28JtYXyTZ2yoNBR2VdLrYFqdHngW5R%2FRRLAZj%2FJvtK%2B%2FX8hLCr1ayOXAZhloy3VbEjOhD9X068vOTqGaG%2FGAySFX Tu6UGZyBsuWSnBxEvrofYerYBRG8sEP7yCp5bahzvY%3D&DBC CODE=CJFD&File Name=BJSK202202010&TABLE Name=cjfdauto&nonce=536F75D443D249FCB872FC2CB11919D0&uid=&TIMESTAMP=1647422523344>

## 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下，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相对贫困问题还较为突出。相对贫困存在的原因，既有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又有分配体制上的不完善问题。本文着重研究完善分配体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其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sup>[1]</sup>

###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步推进

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现代化国家，但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都在批判这些国家在贫富分化方面的现代化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sup>[1]</sup>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是同步推进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标准。生活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这三个标准的相对水平比较直接地影响人民对经济现代化的评价。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共享现代化成果才能体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力点。共同富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关键是准确判断现实中存在的收入差距及其原因。

当下，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但相对贫困问题突出了，主要表现是居民收入

差距仍处于高位。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努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处于收入差距底部的群体收入上升明显，但是处于收入差距顶部的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还在 0.47 上下，明显高于 0.40 的收入差距警戒线。特别需要指出，欧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4 上下时，人均 GDP 已经过了 5 万美元（美国 2020 年人均 GDP 达到 6.3 万美元），而我国基尼系数在 0.47 水平时人均 GDP 才达到 1.04 万美元（2020 年）。据此可以推断，我国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的相对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相对贫困还突出表现在财富差距扩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居民家庭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出现分化，财富差距越来越突出，正从收入不平等向财富不平等转化。一部分人获得投资收益，包括股票收益在内的金融资产收益和房地产收益显著增加，由此拉动了财富基尼系数的增大。据有关方面的数据，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净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 0.61；其中城镇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为 0.553，农村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为 0.621。财富基尼系数明显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从一定意义上说，相对贫困更多表现在财富占有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房产和金融资产的占有上。

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现代化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克服两极分化现象是避开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路径。因此，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绝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共同富裕包含“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共同就是要“分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富裕就是要“做大做好蛋糕”。显然，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发展，不但要做大蛋糕，还要做好蛋糕。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和所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规定：

第一，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是“提低”，以克服相对贫困为重点。共同富裕是在克服了绝对贫困，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在任何时候都有富裕程度的差距，共同富裕不可能消除富裕程度的差距，也不可能简单地拉平收入，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仅允许对发展贡献大的更富裕一些，同时承认个人消费习惯、储蓄投资习惯、个人偏好，允许存在住房的面积、汽车的质量、衣食的质量等家庭财产的差异。共同富裕还是应该有底线的。就像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时期的脱贫攻坚，明确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底线，也就是以处于收入差距底部的居民收入提高为着力点。收入差距也应该有个“合理区间”。收入差距的“合理区间”如何衡量？可以用平均数和大多数的关系来衡量。目前只是用“平均数”来反映各个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水平，不能反映大多数人实际的收入有没有达到平均数。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占

有达到平均数，则意味着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共同富裕会使相对贫困的标准发生变化，贫困的底线会不断被提高，相对贫困的底线标准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共同富裕就基本实现。

第二，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社会的收入阶层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虽然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已有 4 亿人，在世界上人数最多，但在 14 亿人口的国家还只有 1/3 多一点，低收入人群据估算还有 6 亿人。我国的收入结构还是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结构。共同富裕就是要改变这种结构，转向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收入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显著提升并达到大多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原因是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大多数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结构性措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当然不是指高收入群体降为中等收入者）。对发展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现代化的活力源，是消费升级的推动者。中等收入群体能创造支撑增长所需要的巨大消费市场，提高对教育的投资，增强经济的活力。

第三，人的知识和技能共同富裕。根据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财富和收入趋同的力量是知识的扩散和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也就是通常说的“富脑袋”。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他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sup>[2]560</sup> 由此对工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工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因此，“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sup>[2]562</sup> 这种状况在现代更为突出。知识和技能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成为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现实中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区域和城乡居民获取的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相对贫困说到底是有能力的贫困。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教育与技术赛跑”的理论。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居民知识和技能共同富裕，就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技术发展的步伐保持同步，包括居民平等接受教育和技能的不断提升。

针对城乡和区域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涉及三大发展问题：区域二元结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推进现代化，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体现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作用。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原因主要有：一是所处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其收入差距反映市场对各个行业的评价，或者说是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及其调节的结果。二是不同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差异。所需人力资本高的行业报酬水平也高，反之则低。因此，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作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差别可以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得以平均化。至于由行业垄断和非合理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则要靠反垄断和规范市场秩序来解决。这些都不属于在收入分配体制上所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本文所重点考察的是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在改革中实行效率优先政策和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不同个人由于所拥有的要素差距导致收入的分化。本来，只是因为效率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还不足以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但是，基于这种体制产生资本收益和投机暴富，贫富两极分化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马克思的积累理论指出的：在私人投资和积累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从分配体制角度，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既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体制和政策，又要突出共享发展，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 二、完善要素报酬机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包容

收入分配体制实际上涉及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处理问题。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的：“在一些不公平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它降低了经济效率……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不公平却可以加强经济效率。”<sup>[3]54</sup>这就提出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达到均衡的要求。以共同富裕的思路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就是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包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促进效率的分配体制不能轻易放弃，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在分配机制上共享发展成果。

实际上，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中，无论是要素报酬还是按劳分配都包容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推进共同富裕意味着这两种分配机制在坚持效率要求的同时，放大其中的公平要求。

要素报酬的体制优势在于充分动员属于私人所有的要素并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其效率原则体现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种原则在推进共同富裕时，不但需要继续坚持，本身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仅

取决于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关键是评价机制的完善，路径是由市场评价各种要素的贡献，按贡献大小来决定要素报酬。这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的分配。这种评价机制，一能促进企业对要素的有效组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能促进贡献大的优质要素的供给，如明确知识、技术和数据的贡献及相应的报酬可推动创新及创新成果的应用，实现对现代化的创新驱动。

要素报酬机制扩大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不同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的差别。储蓄能力强、知识和技术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个人，致富能力也更强，如果这些要素叠加在某个人身上，收入水平会更高；反之，致富能力则很弱，由此产生收入差距。

研究要素报酬机制可以发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之间不是相互分割和相互替代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关系。劳动者不仅提供劳动，也可以成为某种技术的所有者，也能成为管理者；资本所有者也可能提供劳动和管理。按此原理，完善要素报酬机制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缩小分配结果的差距：

首先，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不是否认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而是要在分配中增加直接劳动者的非直接劳动要素供给，使直接劳动者的收入随着他拥有更多的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提高。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的差别，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劳动者的公平性发展问题。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劳动者也应该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推进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者能够获得到知识和技术要素带来的收入，就可克服由于起点不公平而造成的结果不公平等问题。

其次，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依靠奋斗实现富裕的机会。现实中不是所有富人都是靠继承财富致富的，不乏有处于收入底层的劳动者依靠创新创业致富的成功案例。因此，根据共同富裕的要求，要素报酬的前提是要素的平等供给和平等获取。除了机会均等的市场规则外，尤为重要的是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便利获取市场资源和信息，发展创新创业资本市场等。为一些处于底层的劳动者改变自身地位提供致富的机会的意义在于突破阶层的固化。

第三，以公平占有财产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针对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及由此产生越来越大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解决好财产占有的公平权利问题成为共同富裕的关注点。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认为在私人投资和积累的背景下会产生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意味着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

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两极分化的根本性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但是要实现公平，就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就是使直接劳动者也成为有产者。其路径包括：以企业员工持股、知识产权股权等方式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所有权、收益权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鼓励创新创业，使劳动者也能够获取知识产权收入和资本收入。

农民的土地收益也是财产性收入。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之所以贫困，原因是只有劳动收入，得不到土地收益。农村改革建立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民家庭收入提高除了获取劳动收入外还能获取家庭经营收入。但农产品收入结构中基本上不包含其土地收入。现在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流转就提供了实现土地价值的路径。这种状况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不能在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在流通中产生。农民承包地在经营权流转中折成股权参与分红，土地入市“同地同权”和“同权同价”，农民由此得到土地财产权收益，这是以土地收益富裕农民的重要路径。

劳动者在获得劳动收入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其他要素收入，意味着劳动收入和劳动者收入不是同一概念。虽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后，劳动报酬在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但不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会下降。劳动者收入会随着其拥有更多的非劳动生产要素而提高。这是劳动者在要素报酬机制中的富裕途径。

第四，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现实中上述劳动者获取其他要素并获得相应的收入会遇到各种壁垒。根源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并导致阶层固化。<sup>①</sup>其根源就如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继承财产对不平等起着决定性作用。相当于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占主导地位。社会成员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教育资源享用的不平等可以说是阶层分化的主因。这种不平衡如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成为激励社会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动力。但阶层固化则可能导致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表现在代际传递性加强，同代流动性衰减。一是占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的父辈为了强化和保持自身的资源优势，会努力使其资源（资产、教育投资、人脉）在子辈中传承。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旗号下，各种高价辅导班不仅消费了幼儿和中小學生，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成为贫困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新因素。二是同代流动性衰减。市场机制不健全和阶层分化加剧二者叠加会放大阶层之间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上的不公平，进而阻碍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阶层固化的直接危害，一是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加大。近

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概念，如“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等，说明社会底层阶层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体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因改变现状的难度加大，部分社会成员会丧失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动力，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努力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进而导致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和动力，并消蚀经济发展根基，这对改变贫富分化状况极为不利。二是低收入人群对社会的认同度降低。这会导致社会出现群体性愤恨，如“仇富”“仇官”等，动摇社会稳定基础。阶层固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在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消极影响，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显然，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sup>[1]</sup>也就是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从理论上说，在存在行业、职业、岗位收入差距时，只要劳动力能够在行业、职业、岗位之间畅通流动通道，收入就趋向平均。而在现实中，流动性面临多重障碍。一方面资产、教育等方面资源的代际传递影响到流动机会，导致职业选择机会不公平。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存在阶层流动的壁垒，难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城乡的不平等配置，由此产生的能力差别也会造成阶层固化。这意味着劳动者要在社会流动中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就要成为其他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并获取相应的收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收入分配体制以外的制度创新。涉及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以教育平等促使劳动者获取知识和技术要素，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促使其获取资本和管理收益，以畅通的要素流动为底层劳动者提供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流动通道。

节选自《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洪银兴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学家》，2022，（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TnwwGBQx5lnb6XQsLOsPCqoNkGrevTswwdvzjN3G6Eh1sz4MxwEzspH7amKae1Oo1lCRtmwAkNJ1YMxpDQ4%2BzXLMQTIMqUcNQcDzzDUd6LV%2FaXn2v5AOL2zBuIKwNy0q3b970Fb4ai4b8MC4wb%2BLGQZlx%2B8jFy3V6TT5gOIP3Tk%3D&DBCOD=CFJFD&FileName=JJXJ202202002&TABLEName=cjfdlast2022&nonce=6A9C83CF141C4BCDB065CEF921E9B634&uid=&TIMESTAMP=1647424547031>



## 绿色金融专栏

###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绿色金融是指运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金融业务。绿色金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殷剑峰、王增武（2016）提出绿色金融一方面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向更低能耗和排放水平的产业配置，另一方面是推动环保节能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开发清洁能源等手段降低耗能、排放和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等都会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绿色金融能够发挥正向传导作用，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支持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项目，推动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分析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析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 一、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亮点。

##### 1.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放量持续增加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放量持续增加，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 12 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 8132 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 21 家主要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不断增加，从 2013 年的 5.41 万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1.95 万亿元（见表 1）。绿色信贷的年度增速保持在两位数左右，最为突出的是 2015 年和 2020 年，增速均超过 15%。从 2018 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绿色金融业绩的考核。2019 年，中国的绿色信贷余额首次超过 10 万亿元。中国的绿色债券起步虽晚，但是发展迅速，2015—2019 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逐年上升，除 2015 年外，其余年份发行量均超过 2000 亿元。2017 年，中国新发行的绿色债券余额创历史新高，达到 349.89 亿美元，约占绿色债券余额总量的一半。同时，2017 年的贴标绿色债券规模达到 382.46 亿美元，和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23%。2018 年，中国在境内外市场共发行绿色债券 2826 亿元人民币，和 2017 年相比增加了 12%，占全球绿色债券的 18%，其体量在绿色债券来源国中排名第二。截至 2021 年年初，中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跻身世界前列。

表 1 2013—2020 年中国 21 家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和增速

年份	绿色信贷余额(万亿元)	信贷余额增速(%)
2013	5.41	—
2014	6.01	11.11
2015	7.01	16.64
2016	7.79	11.13
2017	8.66	11.19
2018	9.68	11.78
2019	10.22	9.86
2020	11.95	16.93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对于部分年份的缺乏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补齐。

## 2.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向逐步分明

绿色金融主要投向低碳经济领域的节能、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污染防治、清洁能源、清洁交通、补充营运资金等七个方面,并朝着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方向发展。2020 年年底,绿色交通、可再生资源和节能环保项目的贷款余额及增幅规模位居前列。绿色债券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式,从 2017—2020 年中国绿色债券在低碳经济领域的资金投向(见图 1)可以看出,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在资金投向中占比最大,特别是 2019 年,分别占 26.04%、26.01%、12.73%。补充营运资金或其他方面的投向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是因为其他方面里边包括很多细小的领域。2017 年和 2018 年,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占比之和也超过了 50%,2019 年,清洁交通占比最大。因为随着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已发行的绿色 ABS 包括绿色收益权、绿色租赁权、绿色应收账款、绿色企业贷款和保障房等资产类别。这些产品的直接或间接投向均是绿色低碳项目,例如,其中规模最大的绿色收益债券包括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收费、污水处理收费、绿色出行收益权。首个国家级绿色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交通和自然能源等低碳领域。

## 3.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类别逐渐丰富

近年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其中,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位于绿色金融金字塔的塔基部位,在市场上的投放量最大,作用效果最显著也最稳定,是绿色金融的主打产品。中国的绿色债券以金融债、公司债和企业债为主,投资期限集中在 1—5 年。除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外,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也在持续发力,2019 年中国共推出近 60 项产品,拓宽了绿色金融的服务领域,提升了绿色金融的服务质量。绿色保险是和环境险相关的保险计划,主

要用于应对环境污染、能源替换、生态破坏等问题。绿色租赁最大的特色是能够做到合理高效的利用资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有资产，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绿色 ABS 是将绿色信贷的一部分转化为证券化的资产存在的一种产品，它的出现为绿色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绿色金融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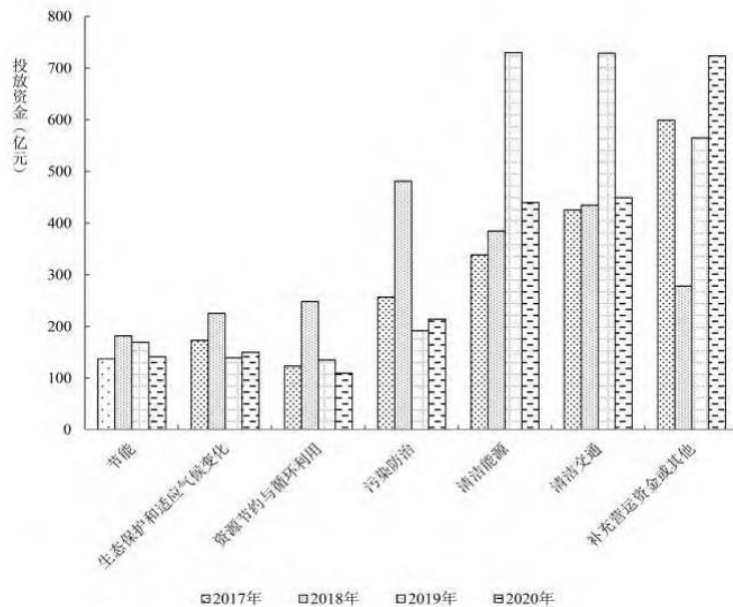


图1 2017—2020年中国绿色债券在低碳经济领域的资金投向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 4.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市场初具雏形

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基本形成了“五大支柱”的局面。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方面，中国加快了市场体系构建的速度，2020年，中国第一项绿色金融国家标准体系正式立项，并被运用到市场上。在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方面，各项工作不断加强，必须披露的信息要点更加明晰，信息披露更加规范，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提高。在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面，政府以原有的绿色信贷评价为基础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方面，中国已初步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多样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各类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共同发展，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绿色金融国际市场方面，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日益成熟，积极利用各类多边和双边平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把绿色金融融入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急迫的市场需求背景下，陶瓷、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多余的资源消耗和不必要的污染排放，产品质量也得到相应提高。而原本的低碳环保产业也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无论是在市场开拓方面，还是在效益提升方面，都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 二、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绿色金融的框架体系在不断完善、政策制度日益优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总量继续增加、服务逐渐丰富，带来的环境效益日益显著。但在政策法规、产品规模、信息披露、政府与市场职责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1. 绿色金融政策法规不够全面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丰富企业的融资模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法规。但是，现阶段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法规还不够全面。一些政策法规只是简单地说明条例框架，没有翔实可行的细则方案，导致下级单位无法采取具体行动。在碳排放抵押、质押融资中，虽然出台了有关政策来鼓励企业采用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的倡议下，没有继续明确鼓励方案。还有一些政策法规的针对性不强，作用对象不够明晰，致使政策效果不佳。绿色金融相关法规里缺乏针对碳交易价格的调控政策，没有稳定的碳交易价格调控系统，无法比较碳减排政策前后的投资增量变化情况。同时，当市场环境有所波动时，碳交易价格不能及时进行有效调整，调控政策漏洞不利于碳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 2. 绿色金融产品存在不足

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标志性目标，需要百万亿规模的资金，绿色金融十分重要。虽然在政府的鼓励下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已经成为中国绿色金融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期限和规模难以和低碳项目的周期与资金需求量相匹配。绿色金融的产品种类会影响到整体的绿色金融服务质量，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可以帮助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量，更好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现阶段中国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有待丰富，碳金融、绿色 ABS、绿色租赁等产品须加快建设。碳金融市场中的各项政策和规则还不够完善，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产品在金融市场中不够活跃。除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外，其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还没有得到推广和大规模的应用，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更好地促进地方绿色金融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支持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 3.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到位

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绿色金融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中国法律法规中暂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环境信息披露规则，即使在信息透明度较好的上市公司中，也少有企业披露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等重要环境数据，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中大部分是定性信息。重

要环境信息披露不足，不仅大众不能获得和绿色金融环境方面的相关信息，而且企业自身也会因为没有及时关注和重视相关信息而导致有关问题的产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是受信息披露影响较大的一类主体，在评估企业环境风险时，由于环境信息的缺乏，得到的结果往往会存在较大偏差；在对企业进行信贷资产定价时，由于一些金融环保数据没有被披露，银行不能做出准确的决策；在制定行业信贷政策时，无法以行业整体的环境数据为支撑，无法做到量化分析、可视化管理。

#### 4. 政府和市场职责不明确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绿色金融监管和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设立健全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市场发挥其自身职责。公共基础设施性质的绿色金融标准是绿色认证或绿色评级的基础，前者属于政府职责，后者属于市场行为。环境信息披露、银行环境风险定价等虽然属于市场行为，而强制环境信息披露、明确银行环境责任都属于金融政策范畴，绿色保险产品开发和运用主要是市场行为，而关于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制度则是政府行为。设立专业的绿色投资机构主要是市场主体行为，而设立相关专业机构离不开金融政策配套支持。风险管理体系既有政府职责，又有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职责，防范区域系统性的绿色金融风险是政府职责，而分散和控制项目的绿色风险则属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职责。政府和市场的职责相互交叉，界限不明，导致效率不高、效果不好。

### 三、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贯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题。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域不仅仅约束在自然资源方面，已经外扩到环境规制、绿色产品等方面，并且还在继续向其他领域发展。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存在转型成本过高、高污染产业资源依赖严重、企业低碳化动能不足、重污染企业的区域转移较明显等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推进低碳经济需要顶层设计、高位统筹、系统推进、持续完善。“2030 碳达峰”和“2060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产业改革增添了向高质量低碳新发展模式转变的动力。金融资源是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管控闸门。绿色金融是高质量低碳新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的创新型金融产品。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深化了传统金融的功能，通过金融手段控制碳排放的强度与总量，加强对节能减排的约束效力，最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体的作用机理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产业重构、技术配置的前端引导与后端倾斜，促进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向环境友好、气候友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重视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提高能效，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灵活应对不断改变的市场环境，承受资本市场的不时冲击。绿色金融要求绿色项目将所有的稀缺租金都当作资本投入，在维持既有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减少污染总量，从而使二氧化碳总需求减少，实现哈特威克法则之存量法则要求。

第二，通过汇集和引导资金投向低碳产业，形成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和增量生态资本，实现哈特威克法则之增量法则要求。能源行业中加快核电等绿色清洁能源的转型发展；钢铁行业、建筑行业等高碳排放行业中实行节能减排；新能源行业中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推广。支持清洁能源行业、绿色建筑行业、新能源行业发展，挖掘低碳环保产业的市场潜力。对不同主体承担的绿色金融职责明确分工，提高工作效率。

绿色金融通过以上两条路径实现金融力量倒逼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低碳领域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的目标。绿色金融既能控制碳资源这一生产要素，又能服务绿色产业，最终形成低碳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低碳经济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节选自《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吴朝霞，张思 湘潭大学商学院

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22，（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oSU3Lig6Eu6NWTp0B50S204lo6cukE%2BOTOVNCywJJ3c5mzTNGBrpSYLvZuMrtK9sJA%2F7u5wdw1p%2FwQduls%2BQFOBmTJleyuTR17vS7Zrx9jj3tV3T4c4l3GtJCgiNmIhCIwX4zP3LGqav17ZfUBJqR2inYH0flfdD3GaZrmjUHHs%3D&DBCOD=CJFD&FileName=QYHL202202008&TABLEName=cjfdautoday&nonce=BAB31CC94924443A9C235C9B13F4B87E&uid=&TIMESTAMP=1647426113219>

## 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分析

###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在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完

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绝非易事，要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更加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实体经济向低碳的转型需要巨大的绿色投融资，然而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更多的还是要依靠绿色金融体系引导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当前，我国正在以宏观视角完善与推进各项相关政策，改善市场环境，这使得绿色金融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sup>[1]</sup>中国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绿色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绿色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存在社会关注度不高、起步较晚等问题，但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下已经逐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发展势头迅猛，在资金规模和基金数量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现有关于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内外基金发展状况的对比，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措施进行总结分析，或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基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而定量分析较为缺乏。同时，传统的单纯从风险收益角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基金进行绩效评价，忽视了绿色基金的环境效益，其评价结果有失偏颇。

基金绩效评价在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理性参考的同时，也是对基金经理人管理能力与基金业绩表现的客观评估。通过对基金绩效的分析，基金经理可以从中总结经验、调整投资计划，进一步提高基金绩效；政府部门可以对基金公司运行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监控金融风险，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尝试对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分析。

## 二、文献综述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已然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核心。当前，全球生态问题日渐凸显，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投向环境和金融之间的关系，研究怎样利用金融手段有效应对环境问题。<sup>[2]</sup>近年来，我国不断拓宽绿色投融资渠道，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之路，环保产业投资融资机制日渐完善，有效推动了我国绿色环保产业的蓬勃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绿色金融依旧处于初级阶段，有着总量不足、效益低下、结构不合理的特点。<sup>[3]</sup>由于缺少担保和抵押，加上绿色技术评估标准不完善，绿色技术企业和项目很难从传统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大量绿色产业发展依然需要依靠有限的政府补贴，绿色金融对绿色环保产业的支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sup>[4]</sup>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广泛的资金来源，是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相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在融资条件、融资成本、投资期限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天然



优势。但是,论及各种融资方式对上市环保企业的作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正向支持作用还远远比不上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因此,中国上市环保企业目前融资的主要来源依然是银行的信贷系统,而非通过资本市场的流动产生。当前,我国绿色融资余额已超 10 万亿元,高达 95% 的资金来自绿色信贷,剩余的 2% 和 3% 则分别来自绿色债券以及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我国绿色融资结构严重失衡,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比重偏低,绿色投融资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sup>[5]</sup>

尽管学者们对于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家一致认为绿色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绿色融资工具,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应该谋求环境效益的增长,这也是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初衷。如何把握环境可持续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平衡,实现资本投资的“双重目标”,是绿色投资如今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目前对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的分析,主要是通过 DEA 模型计算以及将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与传统基金以及市场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的方式。通过 DEA 模型计算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效率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效率普遍处在一个弱有效状态。杨世峰等(2019)发现尽管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综合效率值整体处于中上水平,但大多数处于 DEA 无效状态,对样本基金效率近三年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近三年的效率水平处于上升趋势。<sup>[6]</sup>户琳琳(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间内,样本基金中综合效率有效样本占比为 37.68%,所考察样本均处于规模效率小于 1 的状态,综合效率无效的 86 只基金中有 70 只基金存在纯技术效率无效的情况,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整体市场表现欠佳;通过对产出指标进行投影分析发现,表面来看我国绿色投资基金收益能力表现较好,但成长能力、超额回报方面均存在产出不足问题,收益情况不容乐观。<sup>[7]</sup>但也有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存在规模效应,规模效率虽然不具有持续性,但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sup>[8]</sup>小规模基金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回报。<sup>[9]</sup>

基金绩效的比较结果表明,大多数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水平并未与传统基金和市场平均水平产生显著差异,未获得超额收益。史燕平等(2017)利用三因素模型,对包括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 3 个等权重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进行比较,在剔除掉收益中的风险因素后,相比之下,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水平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sup>[10]</sup>谢会丽等(2016)同样运用三因素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环保主题基金绩效作评价,发现大多数样本基金的业绩表现并没有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并且随着市场走势的上下起伏,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也随之上下波

动。<sup>[11]</sup>周方召等（2019）运用 H-M 和 T-M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基金并未产生优于传统基金的绩效表现，但是部分混合型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能力较强。<sup>[12]</sup>高宏霞等（2018）通过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对样本基金的收益率进行分解，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基金趋同性较严重，未获得超额收益。<sup>[13]</sup>姚志远（2019）利用单因素模型以及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对绿色基金绩效进行了多层次评估，结果显示，尽管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整体风险较小，但是绩效水平与传统基金及大盘相比，并未产生显著差异。<sup>[14]</sup>

关于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能否同时实现的问题，支持的观点认为，一家环境风险较低且治理结构较完善的公司，往往在生产效率、销售业绩等方面也能够具有良好表现，它们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更高的财务绩效水平和更大的利润潜力，由这样的公司组建的投资组合也会获得更高的收益。<sup>[15]</sup>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绿色投资在进行项目筛选时需要参考各种环境标准，投资范围受到限制，分散投资风险的能力下降，可能由此产生更低的收益。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还存在很多不利于绩效改善的问题。首先，我国多数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存在“风格漂移”现象，即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与基金所宣称的投资策略之间出现较大差距甚至发生背离。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基金管理者将本应用于支持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资金多数投资给一些于环境无明显益处的公司或产业。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不仅有损基金声誉，而且与国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背道而驰，真正需要金融支持且环境绩效良好的公司和产业无法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生产活动，破坏了绿色基金的价值发现和传导机制。其次，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异常赎回问题也得到了验证，且这种处置效应更多集中于业绩水平中等的基金。<sup>[16]</sup>基金绩效表现越好，投资者反倒越愿意赎回，在基金绩效表现较差的时候，却大量申购。如果基金管理者了解并有意迎合投资者的这种心理，无心提高基金业绩，反而专注于提升基金规模，在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的同时也造成资源的浪费。

此外，我国投资者对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度不够高。在传统技术依然占据主导的当下，绿色技术想要获得投资者认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绿色技术带来的环境效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量化、定价和收费也是难点所在。受制于绿色产业成本高、周期长、投入大等特点，短期之内公司的财务绩效可能并不会有很大改善。一些对财务绩效敏感的投资者可能会因此转而投向其他业绩更好、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投资者对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度不高还表现在，投资者普遍倾向于短期投资，频繁申购和赎回基金，尤其是在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这会使得基金规模发生较大变动，可动用资金匮乏，基金经理在优化资金配

置、调整投资计划方面变得更加被动，难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不利于基金绩效的提高。

另一个与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改善最直接相关的因素是基金经理的择时选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杨世峰等（2019）应用 Tobit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基金经理能力对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效率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且统计上显著。李学峰等（2019）通过 DEA 模型计算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综合效率的均值整体处在一个弱有效状态，规模效率均值大部分时候高于纯技术效率均值，且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造成基金综合效率弱有效的原因主要是纯技术效率，为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基金经理人在择时选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

借鉴齐岳等（2016）<sup>[17]</sup>对社会责任基金的研究思路，以及危平、舒浩（2018）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从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对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进行评价分析：通过分析基金重仓股情况，可以探究其投资策略是否得到良好执行，是否将所募集资金投资于对环境友好的公司和企业，以此衡量基金的环境效益；通过将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直接收益率、风险和风险调整后收益分别与比较基准进行成对检验，可以直观衡量基金的收益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衡量基金的经济效益。

### 三、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环境效益分析

#### （一）样本基金的选取

由于我国暂时还没有权威的绿色基金分类，我们先按照“绿色”“环保”“美丽”“低碳”“可持续”等关键词对基金名称进行筛选，再结合投资目标和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进一步确认。考虑到基金经理日常操作的主动性程度可能对基金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基金类型上选择的都是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如果是分级基金，则以主基金或 A 级基金为准。综合上述条件共筛选出开放式绿色证券投资基金 44 只，剔除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运行时间少于一年的基金 8 只以及数据存在缺失的基金 4 只，最终得到样本基金共 32 只（见表 3-1），其中混合型基金 18 只，股票型基金 14 只，样本区间是 2020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样本基金各项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天天基金网。

#### （二）绿色证券投资基金重仓股的分布情况分析

为了检验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环境效益，本文从基金重仓股入手，验证样本基金对投资策略是否予以严格执行，是否严格按照“绿色”标准选股投资。以样本基金 2020 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的前十重仓股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所

属行业及经营范围进行整理分析，统计每只基金前十重仓股中与环保相关或所属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有明显益处的股票个数，并计算这些股票所占的持仓比例。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参考东方财富行业分类，统计结果见表 3-2。

表 3-1 样本基金基本情况表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规模(亿元)	成立日期	基金类别	基金管理公司
000017	财通可持续混合	3.15	2013-03-27	混合型基金	财通基金
000042	中证财通可持续发展 100 指数 A	2.47	2013-03-22	股票型基金	财通基金
000120	中银美丽中国混合	12.58	2013-06-07	混合型基金	中银基金
000294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	9.53	2013-11-28	混合型基金	华安基金
000409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	8.41	2014-03-07	股票型基金	鹏华基金
000598	长盛生态环境混合	29.10	2014-09-10	混合型基金	长盛基金
000612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	4.45	2014-06-13	混合型基金	华宝基金
000663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混合	8.27	2014-06-24	混合型基金	国投瑞银基金
000696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	20.81	2014-09-16	股票型基金	汇添富基金
000822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	4.05	2014-11-14	混合型基金	东海基金
000977	长城环保主题混合	47.72	2015-04-08	混合型基金	长城基金
001158	工银新材料新能源股票	24.41	2015-04-28	股票型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
001166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	70.53	2015-04-22	股票型基金	建信基金
001208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 A	37.86	2015-05-12	股票型基金	诺安基金
001471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	39.64	2015-06-29	混合型基金	融通基金
001616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	17.47	2015-12-30	股票型基金	嘉实基金
001856	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	2.96	2017-06-02	混合型基金	易方达基金
001985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 A	10.77	2015-12-18	混合型基金	富国基金
002244	景顺长城低碳科技主题混合	5.94	2016-03-11	混合型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
002593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 A	2.25	2016-05-19	混合型基金	富国基金
003834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14.82	2017-06-07	股票型基金	华夏基金
003984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 A	12.94	2017-03-16	股票型基金	嘉实基金
004640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11.77	2017-08-11	股票型基金	华夏基金
004925	长信低碳环保行业量化股票	3.24	2017-11-09	股票型基金	长信基金
005037	银行新能源新材料 A	0.41	2017-09-15	股票型基金	银华基金
005728	华宝绿色主题混合	3.11	2018-09-04	混合型基金	华宝基金
006122	华安低碳生活混合	7.40	2019-03-12	混合型基金	华安基金
100056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	10.40	2011-08-10	混合型基金	富国基金
163409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LOF)	20.22	2011-05-06	混合型基金	兴全全球基金
398051	中海环保新能源混合	9.46	2010-12-09	混合型基金	中海基金
512580	广发中证环保 ETF	6.79	2017-01-25	股票型基金	广发基金
540008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6.66	2010-06-08	股票型基金	汇丰晋信基金

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持股个数还是平均持股比例来看，不同绿色证券投资基金之间重仓股的检查结果差异较大，32 只样本基金中仅有 13 只基金平均每季度持有的符合条件的股票个数在 4 个以上，占比 40.63%。在表现良好的样本基金中，建信环保产业股票、银华新能源新材料 A、中海环保新能源混合、广发中证环保 ETF 每季度重仓持有的与环保有关行业的股票个数都在 8 到 10 个。有些基金虽然重仓股中与条件相符的股票个数不多，但是所配置资金的比例较高。例如，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平均每季度以 45.42% 的比例重仓持有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股票。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的重仓股中，以新能源、新材料、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为主，重仓股中绿色环保相关行业平均每季度资金配置

比例为 43.79%。上述绿色证券投资基金都很好地执行了投资策略，实现了对环保相关产业的资金供给，环境绩效较高。

表 3-2 样本基金重仓股明细分析结果

基金简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平均比例
财通可持续混合	0	1	0.5	2.21%
中证财通可持续发展 100 指数 A	0	2	0.5	0.71%
中银美丽中国混合	1	3	2	7.80%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	0	0	0	0.00%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	6	9	8	32.81%
长盛生态环境混合	1	3	1.75	11.38%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	2	7	5.5	31.97%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混合	1	3	2.25	9.28%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	3	7	6	27.45%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	0	5	2.25	13.84%
长城环保主题混合	1	3	2	11.07%
工银新材料新能源股票	3	3	3	12.34%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	8	8	8	37.28%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 A	1	2	1.25	3.74%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	1	7	2.75	14.11%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	4	6	5.25	30.78%
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	4	6	5.5	34.56%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 A	3	4	3.25	13.71%
景顺长城低碳科技主题混合	0	4	2.25	15.40%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 A	1	3	2	7.81%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6	8	7.25	45.42%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 A	5	8	6.25	31.89%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3	4	3.25	20.64%
长信低碳环保行业量化股票	2	8	5	22.68%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 A	9	10	9.25	37.95%
华宝绿色主题混合	0	1	0.5	1.39%
华安低碳生活混合	0	3	1.25	4.37%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	1	4	2.5	11.85%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LOF)	1	4	1.75	9.71%
中海环保新能源混合	9	10	9.25	36.92%
广发中证环保 ETF	8	10	9.25	23.02%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5	7	6.25	43.79%

通过对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及经营范围的整理，发现在基金管理者所选择的从事“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中，以汽车、材料、输配电气、电子元件、专用设备等行业相关的企业为主。其中，汽车行业和材料行业所占比重非常大，基金重仓股持股比例总和每季度均保持在行业前三，且比例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远高于其他行业。环保工程、公用事业、水利行业也有关注，但资金配置比例相对较低。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考察所选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重仓股持仓特点，对样本基金前十重仓股进行了整理，统计每季度重仓股持仓排名前五的股票，发现这些企业大多是行业龙头或领域内的领先企业，科研能力强、产销规模大，净利润增速较高。其中，宁德时代持仓基金数以绝对的数量排名稳居第一位，且每季度数量不断增加，其次是隆基股份，持仓基金数在前三季度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虽然在第四季度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了相对较高的水平，通威股份、亿纬锂能也比较受基金管理者的青睐，持仓基金数排名靠前。

但是也有少数样本基金表现较差，偏离了既定的投资策略。评价期内，有 10 只基金在绿色环保相关行业的资金配置甚至不足 10%，其重仓股中平均每季度符合条件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 个。以华安生态优先混合为例，该基金 2020 年每个季度所持有的重仓股中符合条件的股票个数都是 0，平均每季度以 46.01% 的比例重仓持有酿酒、家电、食品饮料、房地产等行业中于环境无明显益处的股票。表现较差的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在重仓股投资上，除上述行业外，还偏向于医疗、医药制造、食品饮料、农牧饲渔、家电、银行、文化传媒等行业，行业分布范围较广。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目前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上市公司是否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以及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没有强制要求，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绿色项目和绿色企业难以识别，也给基金经理人在选股上造成困难，导致基金管理者在对具有“绿色”特征的股票进行甄别筛选时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股票及上市公司的“绿色程度”完全由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者决定。第二，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缺乏严格的投资约束，基金管理者在投资标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些基金管理者为了追求高回报率和优良的业绩表现，会将筹集的资金大量投资于对环境无明显益处的行业，甚至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第三，部分投资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或者盲目跟风，在投资时往往会忽略所选基金的持仓情况，仅仅根据基金的题材和业绩情况进行投资，这不仅会进一步促使基金管理者过分追求高业绩水平而忽视所投资企业的环境效益，而且与绿色基金创立的初衷相背离。

节选自《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分析》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高芸，王若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来源：《长白学刊》，2022，（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oMX%2BwyN9WQKzmq2wMnzGz13Weu0t4J43W2bilqaVaza8cKjKaUgBOwABgvVpXzFSOQipH3joRSrZg1fX1FX9qPlgGmHSPZVThRLwAOHkbnp46JQ2WWYv%2FM3YCzrjoLVYGyW4AtiEOoXfjKiTH5%2BhOdbIvNDD109PrKmXTHoeqqY%3D&DBCOD=CFD&FileName=CBXK202202012&TABLEName=cjfdauto&nonce=549C5DB4799F4596A76016A38228CEE9&uid=&TIMESTAMP=1647427751844>

## 区块链专栏

### 克服合谋掩饰行为：智能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运行机制耦合

#### 一、引言

现有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在创造劳动岗位、推动技术革新、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受有效抵押担保、金融授信机制、社会融资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金融创新<sup>[1]</sup>，而技术进步能够改变供应链金融所嵌入的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态<sup>[2]</sup>。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 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以存货质押形式开展信贷业务，经过近 200 年的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供应链金融发展形态。2001 年，深圳发展银行率先在我国试行存货融资业务；2005 年，深圳发展银行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达成融资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助推了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进程。供应链金融本质上是一个以金融机构为核心，围绕核心企业对供应链上相关中小企业进行授信的过程。该过程涉及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业、有优势地位与良好信用的核心企业以及提供货物质押监管服务的支持性企业，该系统能否平稳运行，其关键在于各利益方在共识机制下所进行的约束博弈的效果。不可否认，供应链金融创新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其风险来源也非常复杂<sup>[3]</sup>。随着这类融资模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推广与实行，供应链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日益凸显。陈志新等<sup>[4]</sup>认为，供应链网络治理是供应链金融深化发展的基础；莫尔（More D）等<sup>[5]</sup>认为，供应链伙伴之间缺乏共同愿景是供应链发展所面临的最关键挑战；宋华<sup>[6]</sup>认为，供应链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建构系统性机制。供应链金融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现金循环和资本运营协作来降低供应链中的财务风险<sup>[7]</sup>，由此本研究认为，供应链金融各参与主体基于供应链金融既有体系所建立并遵循的帕累托最优共同愿景对促进供应链金融生态建设和良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文献主要在供应链金融模式、风险识别、风险度量与控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随着各类供应链金融欺诈事件频发，供应链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因各参与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风险和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供应链金融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关学者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供应链金融进行了深入研究。邱（Qiu GF）等<sup>[8]</sup>从风险类型、风险行为、风险损失三个方面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供应链金融信息风险，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对策。张路<sup>[9]</sup>剖析了传统供应链金融存在的信息化程度不足、数据质量低下、信



用背书延展度低等痛点问题，对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金融模式融合进行了研究。龚强等<sup>[10]</sup>构建和分析了数字供应链金融框架，为供应链金融后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思路。姚（Yao F G）等<sup>[11]</sup>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当前供应链金融存在的风险进行了研究。尽管相关研究为供应链金融的健全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普遍忽视了企业间合谋掩饰行为对供应链金融或者数字供应链金融的作用和影响。由于区块链伪链无法确保上链的原生数据真实可靠<sup>[12]</sup>，供应链金融亟需从传统的人际信任走向数字信任<sup>[13]</sup>，可通过现代金融科技赋能有效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sup>[14]</sup>。因此，本研究区别于既往研究，严格按照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基本思想与框架逻辑，以问题为导向，在系统分析供应链金融中合谋掩饰行为类别及其动因基础上，研究智能区块链与传统供应链金融耦合问题，构建新型供应链金融运行机制以解决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合谋掩饰问题。本研究分析框架参见图 1。

## 二、问题的提出：供应链金融中的合谋掩饰行为

### （一）合谋掩饰行为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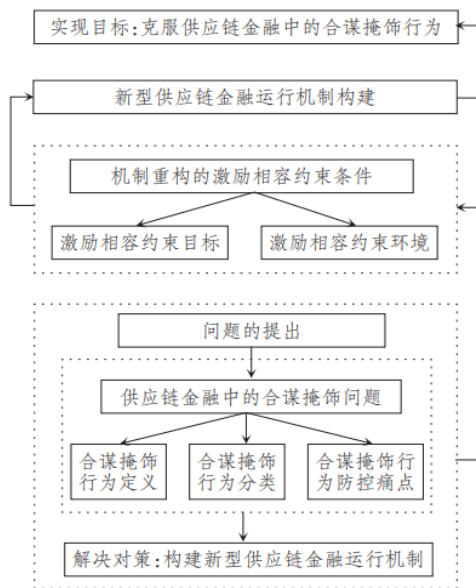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分析框架

近年来，金融欺诈案件频发，包括金融机构、法律部门、科研院所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对相关案件发生的始末、原因及预防措施进行了广泛探讨，合谋欺诈风险成为供应链金融风险防控的焦点和重点。广义的合谋掩饰行为通常被理解为合谋者共同策划的设法遮瞒真实意图的行为活动。供应链金融中的合谋掩饰行为属于经济合谋问题。所谓经济合谋是指，经济当事人之间为取得共同的经济利益或对抗共同的竞争对手，不顾现行制度规定或利用现行制度模糊和空白地带，相

互采取的私下结盟行为<sup>[15]</sup>，具有主观性、隐蔽性等特点，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之内与组织之间，是组成集合的部分子集之间共同谋划的非道德行为。

## （二）合谋掩饰行为的分类

有关合谋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卡特尔等问题，用以解释产业组织间的合谋行为<sup>[16]</sup>。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合谋掩饰问题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如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sup>[17]</sup>、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业企业之间<sup>[18]</sup>、企业与媒体之间<sup>[19]</sup>等。为进一步判别供应链金融中的合谋掩饰行为，本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例进行分析，具体参见表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定义，在企业财务及经营决策过程中，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基于相关案件，在法律表现上，供应链金融按利益联结划分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具体判别标准为企业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从属关系。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合谋掩饰行为主要指金融机构以外的参与主体在寻求资本支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与非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

### 1. 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

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指存在于具有法律从属关系的关联企业之间的利益排他行为，即统一控制行为。尽管关联企业在世界各国的称谓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通过控制所属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活动而建立的商业信托（托拉斯），通过某种合同手段或某家企业控制其他企业多数股权而形成的“母—子—孙”企业形态的相关利益共同体（康采恩）等，但各类关联企业的从属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普遍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部分或全部缺失经济自主性，进而丧失了经营决策自主权，使之在控制公司多种形式的授意过程中，作为关联企业的布局环节存在，为增进整体经营指标服务。因此，关联企业在参与供应链融资的过程中，为实现特定期望目标，常常会通过虚构授信资料、质押担保等“便捷性”手段构建所谓的无缝融资路径，打造供应链融资对接“闭环”，以实现循环运作并放大增强所获取资本的杠杆作用。

### 2. 非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

非关联性合谋掩饰行为指存在于不具有法律从属关系的非关联企业之间的利益排他行为。与关联企业相比，具有合作条件的非关联企业尽管在法律层面上并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但受共同利益驱动，各独立法人单位同样会彼此联结。比如，在商品价格确立、商品质量标准制定、销售市场划分等方面达成约

定协议的协定同盟（卡特尔），通过签订共销产品和共采原料协定而形成的垄断组织（辛迪加）等。在供应链金融中，按照参与主体职责划分，非关联企业合谋掩饰行为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不包含支持性企业的战略协同行为（如非法律从属关系层面或社会从属关系层面的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联结欺诈行为）；二是包含支持性企业的监管俘虏行为（如非法律从属关系层面或社会从属关系层面的中小企业与支持性企业之间，核心企业与支持性企业之间或者中小企业、核心企业、支持性企业三者之间的联结欺诈行为）。

表 1 供应链金融中合谋掩饰行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件

案号	涉案对象	证词来源	相关证词及事项	证据关联分析结果
(2020)黔01民初2482号	GY 中信、HQ 通信、YW 控股、YW 数据、GZ 电信、HST 通信	司法审理	E11:2014年5月12日,YW 控股自愿为 HQ 通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E12:2018年6月27日,YW 数据为 HQ 通信、HST 通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E13:HQ 通信涉嫌伪造合同,虚构与 GZ 电信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骗取贷款	1.YW 控股是 HQ 通信、YW 数据的控股股东,涉案主体在法律表现上为关联企业; 2.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相同,存在统一控制行为
(2014)赞刑初字第33号	GA 华夏、RH 能源、YSS 煤炭、TJ 中储	司法审理	E21:丁某说他有两个煤场,后来才知道这两个煤场是丁某借用别人煤场冒充的; E22:2 000 万元贷款下来后打到了某矿业公司; E23:丁某给物流中心自称王姓经理的人送款 100 万元用于拉走一部分煤和再贷款; E24:后来丁某通过侯某找到邢某签订了购煤合同,先把钱打到邢某公司账户,又从邢某公司账户转出; E25:丁某让侯某找邢某,用邢某的煤场应付一下,邢某答应了; E26:侯某和丁某两人都同邢某说过,拉煤研石就是为了掺假后贷款; E27:2 000 万元贷款下来后打到了邢某公司账户,侯某和丁某又说不要煤了,让把 2 000 万元打回,邢某确实是想帮一下侯某; E28:不认识班某和张某,没有收到过 100 万元	1.涉案主体在法律上表现为非关联企业; 2.结合证词 E21、E25、E26,丁某等通过借煤场应对银行验收、购买煤研石冒充好煤等手段骗取贷款; 3.结合证词 E22、E24、E26、E27、YSS 煤炭在知情的条件下与丁某等在事前通谋,帮助其隐匿和实施犯罪行为; 4.结合证词 E23、E28,支持性企业存在被受监管企业俘虏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

(1) 战略协同行为。战略协同行为主要通过各企业彼此掌握资源的互补性重配实现，即各参与节点全面进行产供销、财务、经营决策等方面的统一协作，进而获取并建立阶段性或长期性市场竞争优势。尽管这种行为在推动企业间研发合作、生产销售、成本控制、风险抵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逆法理性的非道德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发展秩序，使得本应建立在信用体系之上的产业支持性融资变为少数群体背离诚信原则骗取资金支持的便捷通道，既占用社会整体资金资源，又抑制资本在市场中创造价值的正向杠杆作用，致使供应链金融初始功能产生根本性异化。

(2) 监管俘虏行为。支持性企业作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中介，应当公正、合理、客观地代表并满足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严格履行货物仓储物流和质押监管基本义务，发挥黏结双方权责利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部分货物监管单位在与受监管企业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会被受监管企业通过多样化的手段或方法俘虏，主动或被动参与欺诈性融资活动以获取额外利好。被俘虏的支持性企业在监管实施过程中会积极围绕受监管企业主观利益开展活动，如利用质押、

解押流程漏洞或不按既定规程严格管理,使借贷双方在借贷博弈过程中产生公平偏差位势,切实损害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主体利益。

### （三）合谋掩饰行为防控痛点

#### 1.整体业务具有复杂性

供应链将初级生产、经济再生产及生产性服务业紧密串联为一体<sup>[20]</sup>,导致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数量众多(包括资金提供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物流仓储等第三方支持性企业等)。尽管供应链金融具有比较严格的机制设计逻辑,但其作为一种跨越性金融服务模式,包含并形成了由各类产业组织、多种科学技术、多样特点人群等复杂要素构成的业务辐射框架,所涉及业务类型的复杂程度难以估量,对管理者跨越性意识、跨越性思维等运作能力提出了高而系统的要求。因此,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即时、透明、真实的信息交互机制的支持。在现阶段,金融机构出于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需要在供应链金融运行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从整体上对机制内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进行规划和协调,但受自身专业能力及信息掌握与触及范围限制,无法准确了解相关主体的信用及其评估过程,常常会在贷款方(特别是合谋后的贷款方)申请资料真实性、货物价值真实性、货物实际流向把控等方面面临棘手问题。总而言之,由于供应链金融更强调整个供应链风险的监控与防范,其风险控制更加复杂<sup>[21]</sup>。

#### 2.主体行为具有隐蔽性

对非道德企业而言,其取得金融机构高额授信的前提是自身资质状况匹配程度较高,它们通常认为,自身不可获得的先天资质能够通过非合规方式加以修饰,进而获得所谓的优秀后天资质。在某些时候,这一修饰过程无法依靠自身能力达成,需要对其他相关企业许下承诺,以达成合谋协议并形成利益共同体。合谋掩饰行为具有非全局性、隐蔽性等特点,导致针对此类行为的事前调查、事中监督、事后取证工作极其困难。合谋掩饰行为的非全局性是合谋掩饰行为隐蔽性滋生的温床。这种隐蔽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人修饰掩盖主观真实意图的多样化手段上。比如,无实质性交易活动、刻意捏造交易关系的贸易虚构行为;利用金融领域或社会层面机制漏洞、凭借既有业务或资产开展多方融资的一女多嫁行为;虚构质押担保条件、骗取巨额贷款的自保自融行为;串通仓储企业虚开或多开仓单、从不同资金方骗贷的重复虚假仓单行为;利用利率(汇率)波动及货票分离套取利差、汇差及税收利益的三套行为;将基于既有业务和资产所获得的资金投放到其他领域牟利的移花接木行为等<sup>[22]</sup>。

#### 3.自我价值实现具有驱动性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我国多次针对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问题提出相关支持、风险防范与监管意见。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在现实中,供应链金融欺诈案件涉案金额十分巨大,而我国对“数额特别巨大”的金融诈骗案件的量刑标准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然而,在法规监管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供应链金融诈骗事件却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根据前景理论观点,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通常会迷恋诸如保险、赌博等具有事件达成概率低、事件达成后前景值高等特点的小概率事件。对部分资质不合要求的非道德资金需求企业而言,即便是在严格的供应链金融监督指导和量刑处罚下,其欺诈融资成功后的“效益”也远远高于其利用自有资金或欺诈融资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因此,合谋欺诈作为当前供应链金融实际运行过程中重要的风险因素,成为相关非道德企业在主观“小概率超权”下考量非法前景值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冒险选择。

#### 4. 运行机制具有局限性

目前,供应链金融的业务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分别是基于存货质押的业务模式、基于应收账款的业务模式、基于预付账款的业务模式<sup>[23]</sup>。金融机构在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将既有存货、应收账款、未来货权等流动资金占用形式作为质押品与拟贷款客户资信状况进行挂钩评价,而拟贷款客户被授信额度与其自身资信状况密切相关。该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定位。其中,金融机构主要为需求企业提供资金保障与支持;核心企业主要依靠自身规模实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承诺;中小企业通过货权质押及应收账款转让等方式向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支持;支持性企业在为核心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仓储物流服务的同时,为金融机构提供货物质押监管服务。金融机构主要围绕链上核心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授信管理,并根据中小企业动产分类为之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将原来面向单体客户的风险分散到链中多个关联体。尽管这种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把控了供应链金融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整体性风险,却无法有效防控供应链金融各参与主体间的合谋掩饰行为,即便在具有共识机制的区块链环境中,依然难以解决合谋掩饰后上链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换言之,合谋掩饰意味着供应链金融系统内存在合谋意识空缺主体单位,而现行机制和监管手段无法完全识别合谋掩饰下的虚假共识。

节选自《克服合谋掩饰行为:智能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运行机制耦合》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任博，邱国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22，36（03）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oK84FKmJNwqJgkKGOtfHMeq4Ye6DiGGRuhVZ9QINYNhCzMpI0W1GQIfz1U1i7gp8%2F55KcDGIPzHhJ4GXP%2FsIbmD6gCcosPkr1bozDiH4PVPfIUqnqwVTKJOs7t4jObQTHujbpcyDY5R%2FvzeOm5Czkur3PQgEpyH%2FshudoiKuI%3D&DBCOD=CFD&FileName=ZGLT202203004&TABLEName=cjfdautoday&nonce=D3CABF34F4BA4CDD80B42709754F7EEF&uid=&TIMESTAMP=1647428731156>

##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现代税收管理模式探析

### 0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类交易业务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特点。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B2B(企业对企业)、C2C(个人对个人)、B2C(企业对个人)、B2T(企业对团队)等新型电子商务模式涌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传统行业不断与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产业。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税收配套政策存在滞后或缺失，导致各地税务机关在业务性质的认定上和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上不一致，这不仅会增加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也给税务机关带来外部审计和税企争议等潜在的执法风险。此外，税收征管工作需要以大量外部信息作为决策判断依据，而基于网络的交易信息来源各异并经过多次流转，信息散乱且经常出现丢失的情况，信息是否遭到篡改也不易验证，导致税务机关难以判断最终所采集的相关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这一过程中一旦出现多环节线上交易事项，还会给税务机关带来管辖权争议。如果税务机关无法获取充足的纳税人交易信息，征管效率将大幅降低。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征税模式之间的根本矛盾，来源于滞后的被动税收征管模式无法适应线上交易业务不断更新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特点的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逐步成熟并投入实际运用。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征的区块链技术，作为适应互联网环境的一种新型信息技术，可以在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方面发挥驱动作用。基于此，本文研究大数据衍生技术中的区块链技术如何在税收征管中加以运用，以推动数据管税模式变革。



## 1 区块链技术解析

### 1.1 区块链技术的含义及其构成

#### 1.1.1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由共同承担责任和权力平等的无数节点构成，多条交易数据以哈希值形式输入区块中储备，链内节点对区块审核后加密传输，以时间为序列进行储存，形成分布式数据库。简单来说，区块链技术囊括了数学、密码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是一种数据可以在网络成员之间共享、复制和同步的分布式共享账本。它可以将数据加盖时间戳并以链条的形式呈现，同时通过唯一性的密码确保数据不被篡改与伪造。它还可以完整记录每一笔交易事项，并且任何记录在链上的事项，其后续每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在可连接和可追溯的链条下游产生另一个数据区块，并将发生的交易数据完整地保存在区块链中，且同样不可篡改和伪造。

#### 1.1.2 区块链的构成

区块链技术体系由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合约层构成，见图 1。

合约层	以代码脚本为工具，根据用户合约内容对数据库进行编程，用程序的强制性维护合约权益
共识层	以PBFT算法为区块链内所有节点做出决策提供共识机制
网络层	以P2P技术将区块链内所有节点形成共同承载信息的分布式网络
数据层	以时间链式结构与Merkle树数据模型实施数据加密储存及传输

图 1 区块链技术体系构成

(1) 数据层。区块链技术中最基础的是数据层，数据信息进入该层内区块后，由 Merkle 树数据模型验证数据的完整性，若数据出现变更，便会通过模型传递，导致根部的哈希值发生变化，所以可以通过各区块内根哈希值判断数据是否发生篡改。随后，区块以时间序列形成链式结构，所以可以通过时间链式结构的特点对链上区块数据进行追溯。

(2) 网络层。网络层是指通过 P2P(点对点)技术将区块链内每一个节点都作为承担链内信息传递及储存责任的无第三方监督且无中心节点的分布性数据共享网络，任一信息都会储存在所有节点中，任一节点的数据变更都不会影响其他所有节点的数据。

(3) 共识层。共识层是在网络层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区块链没有中心节



点进行活动控制，所以链内的所有数据信息变更都需要经过所有节点审核，而共识层通过 PBFT 算法形成共识机制来使所有节点达成共识。

（4）合约层。合约层主要用于存储代码脚本，实现区块链的可编程作用，通过编写合约程序实现合约维护的效果。

## 1.2 区块链技术的特征

### 1.2.1 去中心化流转模式

区块链节点上传的信息由多方交叉验证和审核是否具有真实有效性。区块链实际运行时，任一区块的所有上传信息都需要面向所有节点而不是通过中心节点进行通信，信息流转变为简单的一对一传输，使信息不会出现复数流转流程导致信息失真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同一信息还将由各节点收录并进行交叉验证和审核，只有所有节点达成共识，认证该信息有效，该信息才能上传至区块链，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并切实维护了各节点权益。

### 1.2.2 分布链式数据仓库

区块链数据库由各节点共同持有，数据采用链式结构储存信息具有不可篡改性。区块链内上传的信息通过审核后，各节点都需要进行信息的分布储存，若某一节点数据库信息丢失，可以通过其他节点进行数据还原。过审区块将上传至以时间为序列的链式数据库，链式结构保留了交易业务的痕迹，新增交易信息在链式数据库中都对应对了唯一的前置信息，所以可以根据前面的记录及时间序列做校验，保证了区块的内容不易篡改。

### 1.2.3 附有权益的共识机制

区块链信息上传需要通过所有节点的审核，但只有附有权益节点才能对上传信息的具体内容进行验证，可见区块链具有信息选择公开透明的特点。交易信息在上传至区块链审核前，首先由各节点提供权益证明(POS)，由含有权益节点方进行信息验证，然后将通过验证的信息区块上传至其他所有节点进行信息审核。而信息审核并不能看到更为详细的信息相关内容，只有所有节点最终达成共识，才能认证该信息真实有效。这种共识机制在保障交易信息公开透明的同时，也切实保障了企业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 2 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转型要求

### 2.1 现行以票管税模式存在的问题

鉴于复杂的征税情况，以及纳税人存在纳税意识有待加强、纳税遵从度不高

的问题，我国形成了“以票管税”的税收征管模式，发票成为税收征管最重要、最常见的商事凭证。电子发票的出现虽然弥补了纸质发票的一些缺陷，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票管税模式存在的问题。

### 2.1.1 发票存在虚假报销问题

电子发票具有流转程序少、可以通过网络查阅、能够与企业内部 ERP(企业资源计划)等系统结合管理等特点，为开票企业带来了时间成本低、管理成本低，以及便于经营者决策等好处，得到快速发展。然而，电子发票目前绝大部分采用打印件报销方式且可以多次打印，而其作为未加密的 PDF 文档很容易通过制图软件进行数据修改。电子发票重复报销和不利于真伪识别的缺陷对企业财务管理是一个较大的考验，也容易造成税收损失。另外，自 2019 年 3 月起，我国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专用发票范围扩大至所有行业的同时，虚开发票涉税违法案件也呈上升趋势。

我国的核心税种——增值税实行的是凭发票注明税款道道抵扣的运行机制，所得税方面发生成本费用支出列支也需取得发票作为合法凭证，大量税收征管措施都围绕发票展开。而无论是纸质发票还是电子发票都存在固有缺陷，导致以票管税模式下存在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2.1.2 电子发票管理过于中心化

现有电子发票数据储存于同一系统中，数据一旦丢失或被篡改将无法追溯和还原。我国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税收数据管理采用“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储备方式，所有发票信息都会实时导入税务部门统一的底账库。集成化信息储存模式便于税务部门统筹管理，降低了部分流转储存成本，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其弊端主要在于底账库数据的安全性及真实有效性不足，如果出现自然风险，如数据库硬件损坏造成数据丢失，将难以调回数据。另外，难以察觉底账库数据被篡改调整的情况，也导致难以追溯和调回实际数据。这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降低了我国涉税数据的安全性及真实有效性。

综合来说，中心化电子发票信息管理模式有利有弊且弊大于利，因为在我国以票管税模式下，保障发票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必须放在第一顺位。发票作为税收征管的核心凭证，如果其真实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将对税收征管的效率和效果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 2.1.3 虚开发票情况大量存在

富裕发票和暴力虚开发票的情况严重加大了我国发票管理风险。根据增值税发票管理有关规定，企业在每月最高领用数量的基础上，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向税务机关申请增加申领发票数量，且纳税信用 A 级或 B 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或 2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一些企业可能会基于自身业务量难以核查的特点，申请大于实际业务量的发票数量，容易出现富裕发票虚开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专门虚开发票的企业，没有发生实际业务，却领购发票进行虚假开具，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究其根本原因，在以票管税模式下，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法企业会想尽办法取得发票增加抵扣或税前扣除，谋取偷逃税款的非法利益。

## 2.2 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征管模式的转型需求

### 2.2.1 建立应对数字经济体系风险的管控模型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已近四成，对 GDP 贡献率近七成，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2。税收征管应以提前预测的方式应对倍增的税收风险。数字经济对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再度挖掘和重构，保留了互联网时代的数据累积与沉淀，线上交易种类复杂且其体系不断革新。以税收征管人员经验为导向的税收征管方法，难以应对和处理新数字交易体系下的各类涉税事项。对于突破空间局限的数字交易模式，其业务量是传统交易的数倍，经验管税的方法被动且滞后，无法应对流通量庞大的数字市场。因此，税收征管必须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数据分析提前预测市场可能出现的涉税风险，建立风险管控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风险，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管成本。

### 2.2.2 建立保障信息真实有效性的系统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对自身更有利的信息获得利益。在税收征管中，一方面，纳税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向税务机关提供不实信息或刻意隐瞒信息，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往往难以判断并制裁这种行为；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需要通过大量外部信息核实企业的涉税行为，如契税征管需要房屋交易、配套费缴纳、纳税人婚姻情况、住房保有情况等信息，土地增值税征管需要土地情况、建设规划、红线划分、政府返还等信息，这些第三方信息需要从房管、土地管理、银行、工商等其他部门获取，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和复杂的流程，降低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有些信息甚至需要从网络上的海量数据中获取，不仅加大了税收征管的工作量，而且无法保障第三方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如何提高涉税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是信息时代税收征管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 2.2.3 建立涉税信息追溯机制

建立税务数据有证可循的追溯机制，抓住税收征管中的“漏税之鱼”。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下，虚开发票、隐瞒收入、虚增费用等行为造成税收大量流失，其重要原因在于涉税数据来源难以查证。实际上，税务机关仅仅依据发票、企业账目及部分外界信息难以真正辨别涉税数据的真伪，不少企业利用这一缺陷虚开、虚抵发票，达到偷逃税款目的。所以，只有对每条涉税信息溯源查证，才能够使偷逃税行为失去滋生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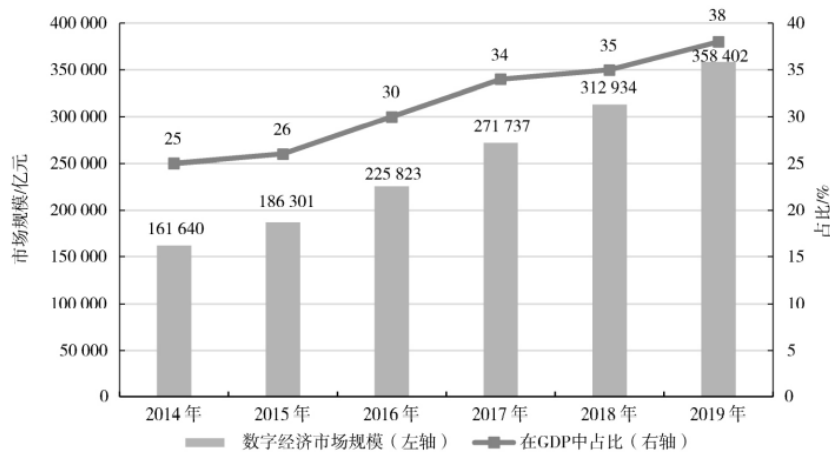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智研咨询)

节选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现代税收管理模式探析》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 陈立, 崔家熙 重庆理工大学

来源: 《财务管理研究》, 2022, (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d5Ek3c17g4vuEjeimvhjy5tLUOE6p339RQBQvPQNPEctWpbJBgXTrXBW3JXLdJsxkfvdahOQp4WkVXhBG4Nil%2Bgm2SY5DmgN3uTOIeku%2FDy4qZsvCx%2Fk5aeBw9uIwKTdUpk2NLUgCZRwHQMkWaIAOIDbrrKSkri%2F5Ten8oBqsgE%3D&DBCODE=CJFD&FileName=CWGL202202011&TABLEName=cjfdauto&nonce=6D7CE963FCBD4AFB8BDEF5CE924250F1&uid=&TIMESTAMP=1647428667234>

## 山商实践探索

###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专业课课程思政原则探讨与体系构建——以《国际经济学》课程为例

2020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对新文科建设进行了解读,指出,在目前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交汇的挑战下,我国年轻人群体,尤其是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下,存在着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危机等问题。

而早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在成长中的需求和期待,其他各学科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新文科建设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新的发力点。通过对新文科建设的分析、定位与发展,进一步挖掘各门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加深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基本原理以及前沿知识的有机融合,真正实现“把课堂变成思政与专业无缝衔接的金课”。

#### 一、相关文献综述及述评

通过认真学习、研究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高校教育工作者从各自学科课程特点出发,一方面,厘清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首先提出应从“高度”、“广度”和“深度”全面提升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专业思政”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关键环节(韩宪洲,2019),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中,实现“高度”与“深度”的把握;同时,考虑到学生终将面向社会,应着力研究课程思政与学生职业素养之间的联系,通过课程思政教育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张晨,2020),课程思政不仅是教师的独角戏,重点是学生是否能够接受、理解并且能够内化和输出,这样的思政课程才是成功的,并会在学生中间产生足够的“广度”。另一方面,从课程出发,研究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方式。吴岩司长在新文科建设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实现强化价值引领,提升学术内涵,并且通过丰富形式载体与创新方法手段,引发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共鸣。因此,将学科资源、学术资源转化为育人

资源,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高德毅,宗爱东,2017);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案例当中,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思政的目的(郭燕,2020);着手于具体专业课程进行思政元素发掘,(张晨,2020;谭琼,2020;韩宪洲,2019;项波等,2020;等等);亦或,结合新冠疫情期间网络授课的经验,提出“互联网+”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创新路径(周婉婷,2020),采用翻转课堂进行教学方式创新(王晓华,2020)等等,增强课程思政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实现课程思政的亲合力和针对性。

另外一个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是,作为课程思政的实际主导者,专业课任课教师应当深刻理解并坚决践行“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理念(蔺绍江等,2020)。在实施课程思政之前,教师应具备相应的德育意识与德育能力(林总等,2021),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树立“三全育人”的教育观,进而发掘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结合点。为确保课程思政落到实处,在组织结构上,应从顶层设计层面通过加强党支部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并设置明确的考评维度等(项波等,2020;周婉婷,2020等),切实保障课程思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实现。

随着人们对新文科建设的深入讨论,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的不断尝试,在实践教学中,我们越来越肯定在新文科的“学科重组、学科交叉”的背景下,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课程内容之间的融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我们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我们也开始脱离简单地、随机地在课堂上加入思政内容或案例,而是从更高层次上思考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以及反思实践中遇到的思政方式过于单一、思政过程缺乏共鸣、思政效果缺乏检验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课程为例,在新文科提出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实践”为指导,尝试构建“国际经济学”课程专业内容与思政内容融合的基本思路与原则,从“课堂+网络+实践”三个角度构建全面、立体的课程思政体系,尝试解决前文所提到的专业课程思政存在的新的问题。

## 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普适性原则分析

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遵守一定的原则,从而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内容的融合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避免专业课思政的偶尔随机、浮于表面、尬聊尬讲。《国际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作为一门哲学社会学类的课程,应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导向,在课程传授过程中要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通过认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新文科建设的相关文件以及习总书记建党 100 周年重要讲话等,笔者认为,《国际经济学》课程思政的一般原则应着重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个人精神品格导向和专业与学科素养导向三个方面发掘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思政元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坚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会讲中国故事、讲懂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四个高度概括凝练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同时也可以作为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元素选取中“个人精神品格导向”的指导原则,引领、塑造学生的高尚品格。专业与学科素养,指的是通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所形成的专业思维。通过不断的专业思维训练,能够使本专业的学生完成专业基础知识积累,增强专业技能,从而具备推动本学科不断前进的专业能力。这一过程是漫长、枯燥甚至是艰苦的。但是每一个学科、每一门课程都是由众多学者、专家如此年复一年严谨求实、孜孜以求、勇于探索而成。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过程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更需要体会到学科和专业每一个研究进步背后学界与业界前辈们的忘我工作与伟大贡献的精神,并成为鞭策自身不断奋进的动力。课程思政不仅要树立学生坚定理想、勇于奋斗的个人品格,还需要树立其对所学专业的热爱与坚持。

笔者认为,这三个原则适用于每一门专业课课程思政的融合,具有普适性的特征。以《国际经济学》课程为例,《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可以分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收支平衡表、外汇市场和汇率以及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国际货币体系五个大部分。按照发掘思政元素的三个原则,结合各个部分内容,理论部分从学者精神品格导向、个人和学科素养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并思考理论提出者在构建理论过程中的严谨精神、理论框架构建的精妙、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贡献等等;在政策内容部分,从社会主义价值观导向出发,比较国内外贸易政策的差异,分析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对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我们都可以从这三个普适性原则为出发点,找出专业课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的思政元素。而且,这三个原则也是专业课教师在为专业知识筛选社会热点制作案例分析时的原则。

### 三、《国际经济学》专业课课程思政“课堂+网络+实践”三位一体融合体系

#### (一) 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工具,构建专业课课程思政内容的主战场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直接面对面的平台，课堂教学是教师与学生进行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最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将课前精心准备的教学内容通过语言、肢体动作、神态表情等多种方式传递给学生，感染学生。教师是这个过程的男/女主角，要坚持教育人者先受教育，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在业务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知识融会贯通，备好每堂课，用优秀的课程思政内容向学生传递专业知识、强化思想认识、提升理想信念，切实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其次，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要做好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重新修正与不断更新。教学大纲是课堂授课的纲领，是教师决定授课内容的依据。在确立了思政内容选择原则之后，就需要将每一章节的思政原则以及据此所选择的思政内容补充到原有的教学大纲中，进行教学大纲的补充和更新，正式成为上课的讲授内容，避免课程思政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同时，对相关教学文件，如授课计划，进行同步更新，将思政内容体现在授课计划的课程目的和任务、课程基本要求、课时分配以及授课板书或课件中。作为大学教学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作业与考核环节中也需体现出课程思政的相应题目，以及考核具体要求。真正将专业课课程思政内化成为专业课程讲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系列内容都需要成为落在纸面、落实成制度，成为任课教师有据可依的文件。“国际经济学”课程作为基础理论课，存在多位老师授课的情况。统一、规范的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大纲便于教师们统一课程思政思想，确保思政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大纲统一的是相应专业内容的思政原则，但并不是固化每一章节的思政内容。任课教师按照思政原则，灵活选择具体的思政内容，既确保思政内容选择的正确性，又保有思政内容时进时新，鲜活多样。

## （二）以网络平台为延伸，构建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全方位学习氛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要求。网络平台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选择。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首先作为互联网在移动终端的应用，使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无时无刻都能建立联系、传递信息、进行分享与讨论等等，体现了全过程的特点。专业课课程思政网络平台的构建，首先，依托于慕课、微课等互联网教学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即时的、优秀的课程思政学习资源，克服了地域与学校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了课程思政的全方位育人的要求。其次，充分利用国家网络思政平台资源实现思政内容的丰富多样，如“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思政学习就可以很好地发掘“学习强国”平台中的国际和

经济两个栏目的资源,既了解到了最新的行业发展动态,又体会到国家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断发展进步。最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帮助教学相关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结与沟通,实现课堂进行无限延伸。习总书记强调,“课程思政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要求。要实现课程思政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做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教育管理部门、教学管理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各类专业课程教师必须协同工作、资源共享、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即实现全员育人的目的。现实工作中,必须借助于互联网、校内网等众多网络平台才能有效且高效地实现这一目的,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生动而多样的思政资源,为学生营造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学习氛围。

### (三) 以课程实践为保障,构建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效果保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最后一公里”是能够将思政学习内化成为学生的自觉学习和自主学习。这是专业课课程思政最终的目标,也是最大的成效。为实现这一目标,专业课程授课教师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翻转课堂等多种创新教学方式,增加学生的课程思政参与度。例如,“国际经济学”课程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部分的内容,就可以采取翻转课堂的方式,通过安排学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的主题学习,搜集、整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实现过程,既学习了专业内容,又开展了思政教育。最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更能够加深对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专业课课程思政的过程中,教师起到的应该是“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大的发挥主体是学生,多鼓励学生发表看法,开展讨论,输出观点,坚定立场。这是非常重要一种实践形式,而且在现实教学过程中也更容易实现。借助于这个过程,加深学生对思政内容的思考,同时也可以考察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态度、看法与学习所得,不断修正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积累课程思政的经验,判断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效果。因此,落地于实践是检验专业课课程思政效果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在新文科建设大讨论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也重点提出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因此,文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有必要逐渐形成一个普适性的原则,通过“课堂+网络+实践”三位一体的方式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要求,以满足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王冰心 山东工商学院

来源：《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2，37（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X%2Fv0eVK2nc6RmmSQnfrQ2nfDYfqTEJ2%2Fee802pS%2FGfS%2B5P5mdCHC1hXwrZnMX2fK7M6VmFfpXMBbaNFULXmto5bjFN2R0TvKwSTb%2F5hmgW4pXRnW85O8ixsLUZp2NikRTOoqxhwSZ4NF53%2B2jWK8kTpz5GHZOyNdh0Hkm2xsNY%3D&DBCOD=LCJFD&FileName=LCYY202201011&TABLEName=cjfdauto&nonce=F53582919FB646F98C8F9DC73B450DC9&uid=&TIMESTAMP=1647430760281>

## 高校学生收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校收费政策不断优化，政府对高校投入的资金逐渐减少，学费收入成为高校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尤其对于省属普通本科高校而言，政府扶持相对较弱，学费收入在高校总体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山东省属财经类普通本科高校 A 高校为例，A 高校拥有全日制在校生 21000 余人，下设非独立建制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校全年的总体收入水平大约为 3.8 亿元，其中学费收入约 1.8 亿元，占全校总体收入水平的 47.37%。然而在学校收费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学生欠费问题凸显，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内部控制薄弱，错漏频出。因此，如何保证学费收入按时足额收缴到位，加强收费管理内部控制，防范风险，已经成为高校收费管理工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 一、高校学生收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差

教育部第 41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指出，“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是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履行的义务”“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不予注册学籍”。高校却因为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甚至不执行。例如学分制教学改革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高校尚未真正做到学分制教学管理，高校的课程还是以教务部门排课为主，无法通过不缴费不予注册学籍，进而不能进行网上选课来约束学生。对于毕业生而言，不缴费不予在学信网上注册学籍，教育部就采集不到毕业生信息，无法为毕业生办理派遣手续，不能进行学历认证，影响学校的毕业生规模，进而可能引发社会关注，因此高校通常不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学

生欠费现象频出,严重影响学校事业收入的实现。

## (二) 校内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有效配合

长期以来,收费都被认为是财务部门的独立职责,在实际工作中,教务部门、学生管理部门、二级学院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配合。例如教务部门只负责学籍和成绩管理、毕业证书发放,对于欠费学生只是在临近毕业时暂缓发放毕业证书,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是缺乏法律依据。学生管理部门更注重校规校纪的传达落实、心理辅导和思想工作。二级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学生安全和维稳,不出事故,学生是否缴费与其关系不大。正是部门之间缺乏相互配合,不能形成工作合力,导致收费工作组织乏力,学费收缴不到位,欠费学生依然享有各种权利,可以评奖、评优,可以申请奖、助学金,对各种考核丝毫不受影响,催缴和制约机制缺失,同样制约学校事业收入的实现。

## (三) 信息传递方式落后,不能实现信息共享

目前,各高校职能部门都已结合自身业务需要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管理系统,但学校层面尚未建立集成化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部门之间彼此都是信息孤岛,未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在收费过程中,教务部门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学生宿舍调整,财务部门负责学费收缴。由于缺乏集成化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学生学籍变动、住宿调整等手续都是人工办理,依靠“申请单”“通知单”等纸质文件传递信息,极易出现遗漏、丢失和延误,致使收费信息不能及时、准确的更新和维护,造成收费数据不准确,少收、漏收、错收的情况无法避免,既影响校方和学生的关系,又影响学校事业收入的应收尽收

## (四) 收费管理的内部控制薄弱

1.内部控制制度缺失。目前,高校学生收费管理主要以国家和上级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即使制定了校内管理制度,也是在执行层面对上位文的解读,多是告知怎么办,如何办,并没有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制定专门的收费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将职责分工、岗位设置、流程管理、风险点控制制度化,人员缺乏、岗位设置缺失、职责权限交叉,内部控制非常薄弱。

2.忽视应收管理。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未设置应收款管理岗,应收款业务由收费员一人承担,将应收和实收混为一谈,收费员既可以填制收费单,录入实收数据,又可以设置和调整应收款金额。同时也未开展应收学费的会计核算,只对实收学费进行会计处理,应收学费、欠交学费数据在会计系统无法体现,不能保证收费账簿和会计账簿相符。收费系统和账务系统管理脱节,无法实现相互的监督和制,也违背了会计信息完整性原则的要求。

3. 忽视收费复核。长期以来，高校管理者大都关注学费能否收缴上来，或者说往往只注重“收费”的结果，而忽略了收费的“管理”。收费人员缺乏，岗位设置缺失，权限交叉，有些高校虽然设置了收费复核岗，却承担了收费员之外的全部收费业务操作，真正履行复核岗位职责的仅限于对收费会计凭证的审核，根本做不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收费复核是对收费管理全方位的监控，包括收费系统和会计核算；是监督和控制，不是具体操作执行；是收费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保障收费内控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 二、完善高校学生收费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 （一）健全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学分制教学改革

一是认真研究国家法规政策，在国家法规政策指引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可操作性，加大制度的执行力。财务部门要完善学生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学生缴费时间、流程以及未按规定缴费承担的“后果”，如“不得进行选课，无法获得学分”等。同时，将缴费率作为学院经费划拨的依据纳入制度管理，按缴费率划拨学院经费，督促二级学院催收学费。学生管理部门要完善学生考评管理办法，加大品德考评的比重和力度，建立学生信用档案，明确规定学生未按规定缴纳学费将作为失信行为计入信用档案，影响品德考评，进而影响评优、评先和评奖。二是加快完善学分制教学改革，实现教务系统和收费系统数据对接，从技术层面控制学生拖欠学费行为，让系统说不，使学生真正体会到欠费是有“成本”的。

### （二）部门通力合作，建立收费联动机制

财务部门归口管理学生收费，要把握和宣传好收费政策，做好收费公示，开拓收费方式，牵头组织学费收缴，反馈缴费情况。学生管理部门归口管理学生，要积极落实资助政策，扎实开展资助管理，切实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缓缴学费手续。同时，严把学生评优、评先、评奖关，将未按规定缴纳学费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评体系。教务部门归口管理学生学籍、成绩和毕业证书发放，要严把新学期学籍注册关，加大法规政策的执行力，同时加强学籍变动管理，完善信息传递机制，确保缴费数据的准确性。各二级学院直接管理学生事务，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自觉缴费的意识，树立缴费受教育的观念，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失信成本，同时配合财务部门做好学费催缴工作。

### （三）建立大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

建立大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将教务部门、学生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的信息系统有效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联动。当学生发生学籍变动或者宿舍调整后，

数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信息管理平台，财务人员依此调整应收数据，恢复收费或者办理退费结算，有效避免因纸质凭据传递丢失、延迟、遗漏和错报等造成的漏收、少收和多收情况，保证学生学籍状态、住宿情况和缴费信息相符，兼顾学校和学生双方利益，也有利于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减少人为操作的随意性和可能性。

#### （四）重视收费管理，加强内部控制

1. 要建立专门的收费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将内控管理的思想、理念和方法体现到制度建设中，用制度约束行为，降低风险。一是分学校各部门层面和财务部门内部两方面做好任务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做好不相容岗位分离；二是设置收费流程，充分分析流程各环节的风险点并制定好相应的管控措施。

2. 加强应收学费管理。一是要分别设置应收管理岗和实收管理岗，二者相互分离。应收管理岗主要负责学生基本信息的录入、变更维护，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申报、审批和备案，应收款初始设置和调整，学生毕业处理，未报到学生清理等；实收管理岗主要负责实收数据、奖助补贷等数据、退费数据的录入，收费票据的开具，缴费数据汇总日报，学生毕业手续办理，收费、退费会计凭证编制等。二是要设置三栏式应收学费备查账，逐笔登记应收学费的增加、减少以及实收学费情况，即使同一天内发生应收学费的增减变动，也要分别登记增加额和减少额，摘要写明增减变动原因，如“依据《教务处学籍变动通知单》5 人休学调减应收学费”“依据《教务处专业调整通知单》30 人调整专业调增应收学费”“9 月 5 日收学生学费”等。详细记录应收学费变动过程，定期核对收费系统收费账簿和备查账簿，保证收费账簿和备查账簿一致。

3. 设置收费复核岗，独立于其他任何收费岗位，全面监督复核收费业务。一是对收费系统管理岗业务的复核，主要包括复核系统用户、角色、权限的设置与分配以及系统参数的配置等。二是对应收管理岗业务的复核，主要包括复核学生初始信息的录入和变更、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审批和执行、应收款的初始设置和调整等。三是对实收管理岗业务的复核，主要包括复核实收数据的录入、收费票据的打印分发、收费日报表和收费会计凭证的编制以及收费管理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数据是否相符等。四是对票据管理岗业务的复核，主要包括复核收费票据的保存、领用、收回和核销等。

### 三、结束语

加强收费管理和内部控制，防范收费风险，是高校一项具体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健全和完善的制度法规做依据，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部门之间的通力配合，需要建立并严格执行收费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保障，需要不断提高的信

息化管理水平来优化。只有多管齐下、多方面推进，才能全面保障学校的事业收入及时应收尽收，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财力支持。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孙莉 山东工商学院财务处

来源：《江苏商论》，2022，（03）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invoice=ujMUpRnkoxo4VXpAYY6flcSXRVMjw6jUBLRmhGJxJ51WMBWI8n9fq07JjuATe%2BoybRWWaEB1xmxPSsKmVrFjaz7MsgCOMWuK4BpsOVIWgq4aiQgMNVufCdcE34rAoe4gSCIY%2FGnRIzg%2BG76rA5vk5viN%2FYC%2BS7IWGzE%2BmbDCKKo%3D&DBC CODE=CJFD&FileName=SAHG202203024&TABLEName=cjfdauto&nonce=A03021A2294F473FA5560178DBA05A90&uid=&TIMESTAMP=1647431486875>





图书馆主页: <http://lib.sdtbu.edu.cn>

扫一扫, 关注我!

